

倦勤斋壁画，聂崇正曾作过深入研究。此处特别需要重述的是它的材底，它不是画在墙上，像西方的湿壁画或干壁画，而是画在绢上。这大概是唐代就已成熟的做法，张彦远有时称为绢画，现不妨称为绢壁画，即先施绘于绢而后裱贴于墙面的壁画。五代欧阳炯《禅月大师应梦罗汉歌》“时捎大绢泥高壁，闭目焚香坐禅室。忽然梦里见真仪，脱下袈裟点神笔”，即此之谓。大绢泥壁的方法到宋代更进一层，观邓椿《画继》卷十可知，这让人不禁想起宋迪对陈用之说过的一段名言：

汝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倚之败墙上，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处为山，下者为水，坎者为谷，缺者为涧，显者为近，晦者为远；神领意造，恍然见其有人禽草木飞动往来之象。了然在目，则随意命笔，默以神会，自然境皆天就，不类人为，是谓活笔。

人们经常提到，这段话和莱奥纳尔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绘画论》中的一段话极其相似，这是引人兴味的。但我想“张绢素讫，倚之败墙上”，应是绢壁画的变通之用，即把绢贴在高低不平而不是平整的墙上。这启发了一种新的看画或作画的方法，完全不同于透视法。其时透视法已被抛弃，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批评过李成的仰画飞檐。

绢壁画在教堂中使用的情况，尚待研究。但宫廷的壁画，多用此法，是可能的。乾隆年间的档案记载如：

正月二十四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内开正月十一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延春阁西门殿内宝座两边、北门内西墙，着王幼学画线法画二张。钦此。乾隆三十五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

五月十六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贴一件，内开本月十一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养心殿内南墙线法画一份，着艾启蒙等改正线法，另用白绢一份。钦此。乾隆三十六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

细味词意，都是指用绢画贴墙。画的不称旨，还可以揭下重画。这种绢壁画不知是否影响了西方的装饰墙纸，但西方传教士到了中国又以此法作壁画，可能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注释

第一单元

1-1. 西风东渐下的澳门历史绘画

* 本研究得到澳门民政总署及下属澳门艺术博物馆支持，特此感谢。

1. Bernard Myers, *MCGRAW-HILL DICTIONARY OF ART*. New York. Vol.3. P.102.

2. 港澳所定“历史绘画”概念首次见于《历史绘画——香港艺术馆藏品选粹》（香港艺术馆，1999年）一书中曾柱昭的《前言》，该画册刊载作品代表了这一命名的基本范例。

3. 何金泉的《序言》载上揭《历史绘画——香港艺术馆藏品选粹》。

4. 见莫小也：《澳门早期西洋美术述论》，《美术观察》，2005年第1期。

5. Jane Turner. *The Dictionary of Art*. MACMILLAN. 1983. Vol.31. P.151.

6. Malcolm Andrews. *Landscape and Western Art*. Oxford. 1999. PP.77-78.

7. 如地图《1626年的亚洲》上方有8个城市地志图像，澳门列为最后一个。 *Early Views and Maps of Macau. 1570—1890*, WATTIS FINE ART. 1999. P.4.

8. PBde Resend 绘，《文化杂志》第35期，第79页。原载《东印度公司防御工事图册》。

9. 另一幅相似作品则以平面图形代替立体建筑的，相对简略，而半岛的方位更加全面，一直绘至关闸交界处。但是作为装饰不如《澳门全图》。 *The Chater Collection Revisited*. WATTIS FINE ART. 2002. P.9.

10. 该图现存香港艺术馆，刊载于上揭《历史绘画》第70页。

11. 笔者从香港艺术博物馆藏品目录得知，博尔杰绘：《澳门野外丧葬》，西塞里刻印，1838年有石版画与设色石版画，此后有西塞里刻印1939年版，名为《从香山炮台俯瞰澳门景色》，再有《澳门香山炮台下望》有英、法两种刻版，分别为托玛斯·艾林·费尔希刻版。

12. James Orange, *The Chater Collection: Pictures relating to China, Hongkong, Macao, 1655—1860*. GREAT BRITAIN. 1924. P.292.

13. 《辞源》，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18、747页。余辉认为“地志学”是地理学中区域地理学的一部分，特指记录某一地区在一段时期内的地形、地貌、建筑等一切地上可视物的沿革，包括“自然地理的变迁与人文建筑的变化”两个部分。见《地志学在古画鉴定中的作用》，《美术观察》，2004年第3期。

14. [清]印光任，张汝霖撰：《澳门记略》，《昭代丛书》彙集，第22卷，1751年。

15. 引文及主要事迹均引自徐新撰：《画家张宝与〈澳门远岛〉》，载《文化杂志》第46期，第169—172页。

16. 《辞源》，商务印书馆，第1854页。

17. 王鹤鸣、马远良主编：《西方人笔下的中国风情画》，上海画报出版社，1997年。

18. 《香港及澳门风貌》，香港艺术馆，1983年。

19. 《昔日乡情：中澳葡风貌》，澳门市政厅，1995年。

20. 见 E. H. Gombrich. *The Story of Art*. Phaidon. 1995. P.428.

21. 图载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编《海贸流珍：中国外销品的风貌》，2003年，第70页。

22. 《南海县志》，第1卷《圣澳》，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刻本。

23. 例如，香港艺术馆于1982年举办《晚清中国外销画》展览并出版了画册。

24. 张廷茂著：《明清时期海上贸易史》，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274页。

25. William Shang. *Drawings from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 1792—1794*. Arts of Asia. 1998. P.75.

26. 此画已经收藏于澳门艺术博物馆，上有题字，虽然无作者及日期，可认定是19世纪有绘画功底者所作。

27. 18世纪末，英国画家亚力山大·葛的记录。引自 Carl Crossman. *The Decorative Art of the China Trade*. 1991. P.9.

28. 澳门艺术博物馆藏 HP1998-281-288，佚名中国画家，水彩并勾线，31.5×19cm，约1880年，通草纸本。各画题名为：1. 出游；2. 八卦轿；3. 舞狮；4. 点炮；5. 鱼虾灯；6. 鲜桃青蛙；7. 舞鲤鱼；8. 放炮仗。

29. 威廉斯经过长年的整理和研究通草纸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些画是为了迎合旅游者的口味，作为纪念品带回西方的。我们即使看到了它们的局限性，也不可否认草纸画包含了许多信息。从正式的朝服，我们可以发现其他相关的信息，比如在西方博物馆里有关19世纪中国皇帝和官员服饰的收藏价值。植物学家可以看到在欧洲人指导下完成的有关植物的插图。” Ilian Williams, *Views From the West-Chinese Pith Paper Paintings*. Arts of Asia. Sep-Des. 2002. P.147.

30. 《中国丛报》1839年6月刊，引自汤开建等编：《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纪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69页。

31. 刘明倩：《贯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谈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广州外销画》，载《18—19世纪羊城风貌：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院藏广州外销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页。

1-2. 早期的中国艺术风格

13世纪至16世纪意大利艺术中的中国元素

1. 休·昂纳 (H. Honour), 《中国艺术风格——解读中国》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伦敦，1961年。

2. F. 莫雷纳 (F. Morena), 《中国艺术风格——14世

纪至19世纪东方艺术风格在意大利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the Oriental Style in Italy from the 14th to the 19th Century*), 佛罗伦萨, 2009年。

3. L. 阿诺德(L. Arnold), 《高贵的礼物和教皇的宝物——去中国的方济各会使团及其对西方艺术的影响(1250—1350)》(*Princely gifts and papal treasures. The Franciscan mission to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art of the West 1250—1350*), 旧金山, 1999年。

4. H. 田中(H. Tanaka), 《14世纪锡耶纳绘画及蒙古族、汉族对其的影响——试析西蒙·马丁尼和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的主要作品》(*Fourteen Century Siense Paintings and Mongolian and Chinese Influences. The Analysis of Simone Martini's Works and Ambrogio Lorenzetti's major works*), 引自《艺术历史》, 1985年第7期, 第1—57页。

5. P. 西蒙斯(P. Simmons), 《中国风格图案的丝绸》(*Chinese Patterned Silk*), 纽约, 1948年, 第23页, 图29。

6. G. 库拉托拉(G. Curatola), 《Venezia, la via della seta e le arti orientali》, 引自《Le vie della seta e Venezia》, 罗马, 1990年, 第41—55页。

7. C. 皮科帕索(C. Piccolpasso Durantino), 《制陶工人的艺术(三册)》(*I tre libri dell' arte del vasajo*), 佩扎罗, 1879年, 第32页。

8. A. 阿尔韦尔(A. Alverà Bortolotto), 《Storia della ceramica a Venezia dagli albori alla fine della Repubblica》, 佛罗伦萨, XLVI—XLVIII, 1981年, 第64—65页。

9. F. 莫雷纳(F. Morena), 《Dalle Indie orientali alla corte di Toscana. Collezioni di arte cinese e giapponese a Palazzo Pitti》, 佛罗伦萨, 2005年。

10. A. 阿里纳利(A. Alinari), 《La porcellana dei Medici: bibliografia ragionata e catalogo essenziale》, 菲拉拉, 2009年。

11. T. H. 克拉克(T. H. Clarke), 《Lattimo. A Group of Venetian Glass Enamelled on a Opaque-White Ground》, 引自《玻璃研究杂志》, XVI, 1974年, 第22—56页。

1-3. 从文化与文明转变的视野出发

重新考虑19世纪与20世纪外国基督传教士学者的国际意识与本土良心

1. 互联网管理及各种不道德与非法网络行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大量增长, 然而绝大多数此类研究的最初版本, 据我所知是英文的。出乎意料的是, 在中国的出版物中, 很少有人以尖锐而批判的思考去研究这些问题。我发现的有关网络犯罪和不良网络行为的研究中, 比较能反映问题

的有: 伊冯娜·朱克斯(Yvonne Jewkes)和马吉德·亚尔(Majid Yar)编辑的《网络犯罪手册》(*Handbook of Internet Crime*, 卡伦顿: 威廉出版社, 2010年); 乔纳森·纽特雷恩(Jonathan E. Neuchterlein)与非利普·韦泽(Philip J. Weiser)著:《数码的十字路口》(*Digital Crossroads: Telecommunications Law and Policy in the Internet Age*), 马萨诸塞州剑桥: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2013年; Roland Heckerö 著的《互联网的阴暗面: 网络风险和信息安全》(*The Dark Sides of the Internet: On Cyber Threats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彼得·朗出版社, 2013年。

若要了解这些领域的非全球性状况, 有必要读一读巴尼·沃夫(Barney Warf)著的《互联网的全球地理学》(*Global Geographies of the Internet*), 荷兰德瑞克: 施普林格出版公司, 2013年。其中一些有关互联网扩张及其国际性方面限制的经验之谈。

有关互联网中发生的道德问题的研究出版物, 每年都在大量增长, 刺激人们在过去十年中做了更多的大众研究, 例如保罗·波西耶(Paul Bocij)出版了《互联网的阴暗面: 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网络犯罪分子的伤害》(*The Dark Side of the Internet: Protecting Yourself and Your Family from Online Criminals*), 康涅狄格州西港: 普理雅各出版社, 2006年。从尝试规范化互联网环境的角度所做的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珍妮特·斯滕伯格(Janet Sternberg)著的《互联网中的不端行为: 对虚拟互联网交流的引导》(*Misbehavior in Cyber Places: The Regulation of Online Conduct in Virtual Communities on the Internet*), 马里兰州兰哈姆: 美国大学出版社, 2012年。

我对有关网络“行为不当”发生兴趣是从研究中国的“人肉搜索”开始的, 因此下面这些著作研究的是有关网络上发生的“陌生感”和互相之间严重信任缺失的问题, 同时这些著作也提到了一些中国网民新的、创造性地使用这一新科技环境的倾向方式。我看到的两部研究这些问题的著作是哥伦比亚大学杨国斌的《连线力: 中国网民在行动》(*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邓艳华译,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09年; 及大卫·库尔特·赫罗尔德(David Kurt Herold)与彼得·马罗尔特(Peter Marolt)编:《中国的网络社会: 创造、庆祝和利用网络狂欢节》(*Online Society in China: Creating, Celebrating, and Instrumentalising the Online Carnival*), 伦敦、纽约: 劳特利奇书局, 2011年。

2. 我认为在研究外国僧侣和穆斯林传教士传教生涯的过程中, 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 他们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一直在中国充当传教士的角色, 并为此产生了很多传教方面的作品。

3. 我在一篇文章中已对这一系列问题做过详细阐述。在文

章中我试图探究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意义，这是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起源于香港，见秦风著：《在台风中心：从基督教传教士批判中学到的经验教训》，2007年，8：1—2，第91—116页。随后这篇文章稍长一些的版本出现在由玛丽安·格里克（Marián Galik）和马丁·斯罗伯尼克（Martin Slobodnik）编：《穆罕默德和帖木儿去世日之间的东方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632—1405）》（*Eastern Christianity, Judaism and Islam between the Death of Muhammad and Tamerlane (632—1405)*），伯拉第斯拉瓦：斯洛伐克文理学院东方研究所，2011年，第265—291页。

4. 以下这些对转变和本质的反映首次发表在我的一篇文章《中国文化转变维度的哲学探索》（*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 of the Transformative Dimension in Chinese Culture*）中，并刊登在《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35：4，2008年12月，第663—682页。这篇论文的部分选段重复出现在本季刊中，见第664—666页。

5. 在与我的老师中英教授及我的同事吴有能博士和张颖博士交流之后，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变得明晰起来。

6. 这是对与现实幻象有关的基本思想的提炼。这些基本思想引自尤金·罗森斯托克-胡絮（Eugen Rosenstock-Huessy）的著作《基督教的未来或现代精神迷途》（*The Christian Future or The Modern Mind Outrun*）中的“The Cross as Reality”章节（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66年），第166—176页。

7. 在另一种语境下，我面对的是根植于文化表达现实的一种三重视野，这在复杂的现实文化视野中，是在转变维度上更为充分的视野。之间我区分了什么是所谓“现实的三重世界理论”，亦即由好玩的、严肃的和创造性/转变性的世界构成的三重世界。它出现在以下文章的最后几页，并在本文所附表格中得到了更深刻的阐释：“重新考虑一个比较哲学视角下游戏与运动的客观性与伦理性维度”，载于“Orientierung”（波恩大学），2/2005，2005年12月，第1—22页。

8. 1990年我开始发表一系列研究詹姆斯·理雅各的生平和著作的文章，自那时起，这些研究和论题就一直是我特别关注的领域，这些年来在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德国科学基金会、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等多个机构的支持下，我的这些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提高。最近，我从香港浸会大学研究委员会提供的一项跨学科研究基金中获益匪浅，该基金能帮助我们在浸会大学图书馆系统下建立一个小型多语种汉学图书馆。在这个名为“现当代汉学家经典译文和中文著作的跨学科研究”的研究项目基金的慷慨资助下，我们完成了这一工作。

9. 这个理念成了蒂利希（Tillich）神学研究的特征，并且蒂利希在布道中将其传输给了更广泛的听众。见蒂利希的

著作《新存在》（*The New Being*，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95年）一篇名为《我们的终极关怀》（*Our Ultimate Concern*）的布道，该布道内容来自《路加福音》（Luke）卷10，第38—42页和第152—160页。随后，布朗·麦肯齐博士（D. Mackenzie Brown）编撰了有关同一主题的鸿篇巨制《终极关怀：蒂利希的对话》（*Ultimate Concern: Tillich in Dialogue*，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63年）。

10. 为了从文化变革的角度强调这些问题，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区分精神革命和军事革命：传统中国社会后期，新教传教士-学者们的冥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Distinguishing Spiritual Revolution from Military Revolution: Meditations on the Impact of Chinese Literature by Protestant Missionary-Scholar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计划于2014年夏天发表于上海陶飞亚、赖品超主编的《第六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

11. 此处及以下为其早期生活方面的细节在李伟丽著：《俄罗斯汉学的奠基——比丘林》中有所总结，载于柳若梅等著《沟通中俄文化的桥梁：俄罗斯汉学史上的院士汉学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149—150页。

12. 见李伟丽著：《尼·雅·备丘林及其汉学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3页中与此总结一致的另一叙述。

13. 曾在李伟丽著：《俄罗斯汉学的奠基——比丘林中》提及，第152页。

14. 详情见李伟丽著：《尼·雅·备丘林及其汉学研究》，第7—8页。

15. 最早由彼得·阿达梅克教授（Prof. Piotr Adamek）为我提供的文档资料是科申（Koshin）写的一篇文章，名为《关于拉吉夫未发表的作品“基于在亚洲的博物馆中找到的文档资料”》（*About the Unpublished Works by Iakinf Bichurin “Based upon Archival Materials found in Asian Museums”*），《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第3卷，1938年，第628—644页。

16. 拉吉夫是在北京定居七年后才对这些著作做的注解，见李伟丽著：《俄罗斯汉学的奠基——比丘林》，第150页。科申将其完成注解的时间标注为1814年（见科申著《关于拉吉夫未发表的作品》（*Über die unveröffentlichten Arbeiten des Hyazinth Bitschurin*，第631页）。而使研究人员感到遗憾的是，李伟丽书中的文献目录只包括拉吉夫发表过的资料。见李伟丽著：《尼·雅·备丘林及其汉学研究》，第161—167页。

17. 拉吉夫对整部著作的俄语注解与这部著作标准的汉语文本一同出现在一附录中，见李伟丽著：《尼·雅·备丘林及其汉学研究》，第146—157页。

18. 科申曾强调过这一点，见科申著《关于拉吉夫未发表

- 的作品》，第 631、634 页，第 6、7—9、14、16—18 条。这些辞典不仅包括汉 - 俄双语辞典（第 7 条和第 17 条），还包括满语 - 汉语 - 俄语三语辞典（第 8—9 条，第 14 条）及以俄语字母排序的汉语 - 拉丁语辞典。
19. 这一点可以在科申的著作中找到认证，见《关于拉吉夫未发表的作品》，第 631 页，第 2 条。
20. 在李伟丽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总结，见《俄罗斯汉学的奠基——比丘林》，第 157—162 页。
21. 见李伟丽著：《俄罗斯汉学的奠基——比丘林》，第 162—166 页。更全面深入的说明可见李伟丽著：《尼·雅·备丘林及其汉学研究》，第 58—92 页。
22. 这被认为是拉吉夫为俄国人独立研究汉学所做的一大贡献，拉吉夫和很多居于北京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有个人往来，对他们的著作及其有关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均有所了解。详情见李伟丽著：《俄罗斯汉学的奠基——比丘林》，第 167 页。
23. 对理雅各传教生涯的深入研究可见费乐仁著两卷本的《“人所当尽的本分”的实现：理雅各与苏格兰新教徒在中国的相遇》（*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 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法兰克福：彼得·朗出版社，2004 年后面的几个章节。
24. 做出这些决定的相关背景及理雅各之后对中文的学习可见费乐仁《“人所当尽的本分”的实现》，第 1 卷，第 111—119 页。
25. 见蒂姆·巴雷特（Tim Barrett）著：《兴味索然的独一性：中文书与不列颠学者之简史》（*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伦敦：威尔斯威普出版社，1989 年，第 66—72 页。
26. 理雅各返回香港更深层次的背景可见费乐仁著《“人所当尽的本分”的实现》，第 2 卷，第 203—220 页。
27. 本著作第二次部分修改后的版本是 1893—1895 年间在牛津再版的，这是后来在英国、香港、美国和中国又再版印刷时普遍采用的版本。有关于此，更多描写可参见陈善伟与波拉德（David E. Pollard）编辑的《翻译百科全书：中英互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401—422 页中费乐仁写的“詹姆斯·理雅各”；以及费乐仁作“中文”，载皮特·弗朗斯（Peter France）和肯尼斯·海恩斯（Kenneth Haynes）编：《英语文学翻译的牛津历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English*），第 4 卷：1790—1900 年，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55—362 页。
28. 理雅各在牛津的教学生涯及其重大意义可见吉瑞德著：《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55—362 页。
29. 理雅各汉学翻译标准的影响被详细阐述为十五点，见费乐仁著：《典籍还是圣书？理雅各与卫礼贤的儒家、道家全集翻译中的语法与转译问题》，载于马克思·蒂格（Max Deeg），奥利弗·福利伯格（Oliver Frieberger）和克里斯托夫·克莱恩（Christoph Kline）主编的《亚洲宗教历史上的经典之作》（*Canonization and Canon Form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sian Religions*，维也纳：奥地利科学院出版社，2011 年），第 421—463 页。
30. 根据罗马天主教会的宣传刊物，这份刊物记录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顾赛芬的著作并于其死后十五年出版，顾赛芬被称为“sinologue émérite”，即“汉学荣誉教授”，这是作为汉学学者的极大荣誉。引用语见《*Procure des Missions “Chine, Ceylon, Madagascar”*》，河北献县天主堂风俗照（里尔：传教士出版社，1934 年），第 87 页。
31. 参见儒莲奖获得者名单，顾赛芬分别于 1886 年、1891 年和 1895 年先后三次获得此奖。值得注意的是，理雅各因其对上述中国古典文学所做的显著贡献于 1875 年获得此奖的首奖，详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Prix-Stanislas_Julien（2014 年 6 月 1 日上传）。
32. 有关顾赛芬生平及著作的研究于 2014 年 7 月由笔者夫妇及贺旦恩博士完成。这项研究在法国万弗的耶稣会档案馆进行，香港浸会大学对此提供资金支持，在注释 8 中已有所提及。
33. 此处及以下内容是我根据《中国滑轮——河北献县天主堂》（*Gerbes chinoises*），第 40—60 页论述的。第 40—41 页是对大教堂的描述及一张摄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的大教堂照片。
34. 记述中提到的另一点是，据称，教会由 27 名神职人员及 51 名传教士组成，传教士中 22 名是欧洲人，剩下的 29 人为中国人。其时，中国共有耶稣会士 57 人，依据他们的见习程度分类如下：8 位教父，16 位兄弟，33 位见习修士。而附属教会中的修女则没有有关数量的记载，对她们中欧洲人与中国人的比例也没有做具体说明。见《中国滑轮——河北献县天主堂》，第 58—59 页。
35. 整体的综合设施被记述为十种不同的规格，见《中国滑轮——河北献县天主堂》，第 40—41 页中有所罗列。
36. 文本声称，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仅中等学校已有 275 名学生。见《中国滑轮——河北献县天主堂》，第 43 页。
37. 正如所料，以拉丁文授课的课程有神学、教会法、对圣经的学习以及礼拜仪式；以中文授课的课程有哲学、数学、物理和化学。见《中国滑轮——河北献县天主堂》，第 52—53 页。
38. 《中国滑轮——河北献县天主堂》，第 45 页。
39. 有关耶稣会机构及同僚的陈述见《中国滑轮——河北献县天主堂》，第 87—88 页，尽管某些细节并不十分准确；魏若望（John W. Wittek）著《顾赛芬》，载杰拉尔·H·安德森（Gerald H. Anderson）编：《基督教传教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Missions*），纽约：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 1998年, 第156页; 雨果·贝拉德(Hugues Beylard)著:《中国名字: 顾赛芬》(*Nombre chinois GU Saiten, Dexing*), 载查尔斯·E·奥尼尔和华金·玛利亚·多明戈(Joaquín María Domínguez)主编:《耶稣会历史词典》(*Diccionario Histórico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罗马: 耶稣会历史研究所及马德里卡米亚斯天主教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第2卷, 第991页。

40. 法国汉学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亨利·科迪尔(Henri Cordier)编制的讣文(*Necrologie*) Couvreur, S.J. Couvreur Kou Sai-fen 顧賽芬, T'oung-Pao(第二系列), 卷19, 3/4号(1918年7月—1919年10月), 第253—253页。相关部分参见许光华著:《法国汉学史》,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9年。

41. 见耶稣会士P. 亨利·约瑟夫·乐华(P. Henri-Joseph Leroy): *En Chine au Tché-Ly S.-E.: Une mission d'après les missionnaires* (Inp.): Desclé, de Brouwer et Compagnie, 1900)。

42. 如法国万弗耶稣会档案馆(GR 51, Patres tertiae probationis), 第1卷, 1862—1908年, 第63项所示。

43. 图片“顾赛芬”见耶稣会士P. 亨利·约瑟夫·乐华著《*En Chine au Tché-Ly S.-E.*》, 第283页。

44. 顾赛芬性格的总结可见《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n Year 7》, 77号刊(1920年1月), 第21页, 并形容他“恪守宗教仪式, 如同神父保持异常惊人的沉默”。

45. 这一评价写于其死后十五年, 顾赛芬以虔诚和博学为人所知, 被其耶稣会同僚形容为三大杰出的作家之一。他“工作严谨, 持之以恒”, 提供了大量的材料, 一些材料不仅在他生活的时代影响巨大, 甚至在其1919年去世后很多年, 依然保持其强劲的影响力。见《中国滑轮——河北献县天主堂》, 第87页。

46. 第一部是以同时代语言于1884年完成的法-汉词典; 第二部是于1890年完成的汉-法词典; 第三部是于1892年完成的汉语-拉丁语词典; 第四部是于1903年完成的袖珍型汉-法词典; 第五部是于1904年出版的法语版本的中国古典文学词典。

47. 全称为《*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 contenant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usitée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Ho-kien fou | 河间府 | :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884, 共2卷, 正文达1007页之多。奖项宣布可见《*Comptes-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第30卷, 第4期, 第527页。

48. 其中的一个事实是翻译时,《春秋》和《左传》经常被处理为一卷, 即二者并不总是被认为是不同的两部分, 尽管在儒家传统中, 二者的确是以两部不同文学的典范出现的。

49. 在对比理雅各和卫礼贤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之后,

这位作者在一篇论文中对顾赛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做出了更为透彻全面的分析, 论文名为“A Comparative Grammatological Overview and Initial Interpretive Problems related to Couvreur's (1835-1919) *Les Quatres Livres*”, 在关于传教士汉学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发表, 会议于2014年1月3-4日在辅仁大学举行。该论文应于会议结束后不久出版。

50. 引自《中国滑轮——河北献县天主堂》, 第87页。

51. 第三个儒莲奖的获得是由于顾赛芬一部名为《*Choix de documents, lettres officielles, proclamations, edits, mémoriaux, inscriptions, etc.* (Ho-kien fou | 河间府 | :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894)》的作品。有关第三个儒莲奖的内容引自《*Comptes-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卷39, 第6期(1895), 第517页。

52. 基于《中国滑轮——河北献县天主堂》中的总结, 第88页。

53. 他的《*Kungtse Gespräche*》第一版产生于1910年, 由耶拿一家尤金·德得利(Eugen Diederich)经营的出版社出版, 多以“字面含义”呈现, 更为现代化的版本可见理雅各称之为《论集》的版本。

54. 以布鲁姆哈德和魏礼贤来往信件为基础的一本书于二位逝世后出版, 记录了这种影响。可见克里斯托夫·布鲁姆哈德(Christoph Blumhardt)著, 亚瑟·里奇(Arthur Rich)编辑的《世界上的基督徒: 致卫礼贤的一封信》(*Christ in the World: Letters to Richard Wilhelm*, 苏黎世: 茨温利出版社, 1958年)。

55. 有关卫礼贤在青岛期间工作方面所做的总结和评价, 参考孙立新、蒋锐主编的《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卫礼贤》,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4年), 及格伯·莉迪亚(Lydia Gerber)写的《卫礼贤在德国租借胶州的传教工作, 1899—1914年》(*The Mission Work of Richard Wilhelm in the German Lease of Jiaozhou, 1899—1914*), 后者载于克劳斯·赫希编辑的《卫礼贤: 两个世界的大使》(法兰克福: IKO出版社, 1958年)中。

56. 卫礼贤在德国与日本战争期间写的日记得以出版, 以德语记录了当时所发生的状况。参见卫礼贤的《1914年世界大战期间在青岛的艰苦岁月: 卫礼贤在围攻青岛期间的日记》(*During the Difficult Days in Qīngdǎo in the World War 1914: Diary by Dr. Richard Wilhelm during the Siege against Qīngdǎo*), 柏林: 胡腾Hutten-Verlag出版社, 1915年。

57. 有关卫礼贤广泛的中文与跨文化文学研究, 有一部极好的中文著作, 是范劲著的《卫礼贤之名——对一个边际文化符号的考察》,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

58. 有关卫礼贤这一重要的世界观转变的叙述, 参见莉迪亚·格伯的《卫礼贤的“神学解放”》(*Richard*

Wilhelm's 'theologische Emanzipation'), 载多萝西娅·魏珀曼(Dorothea Wippermann)、克劳斯·赫什(Klaus Hirsh)与乔治·艾伯特纳瑟(Georg Ebertschüser)主编:《20世纪初的各色文化:神学家、传教士与汉学家卫礼贤》(Interkulturalität im frühen 20. Jahrhundert: Wilhelm - Theologe, Missionar und Sinologe), 法兰克福:IKO出版社, 2007年, 第113—139页。

59. 见哈特穆特·瓦尔拉芬斯(Hartmut Walravens)编:《卫礼贤:在中国的传教士生涯及为中国利益奔走呼吁》(Wilhelm: Missionary in China and Intermediating Advocate for the Benefit of China), 圣奥古斯丁:东方文献研究所, 2008年, 第61—159页。

60. 到目前为止,我和我的同事已经能够订正卫礼贤包括德语在内的十种语言的文章译本,但可能还有更多的文章我们目前尚未触及。

61. 这也是这一特殊经学翻译最具争议性的版本之一,它既不沿袭标准的中文文本,又在文本、注解及卫礼贤对这些注解的总结中模糊不清。有关这一系列问题更多的细节,请参考费乐仁著:《攀登汉学中喜马拉雅山的巨擘——从比较理雅各和卫礼贤翻译及诠释儒教古典经文中所得之启迪》,载《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通讯》15: 2, 2005年6月,第21—57页,和费乐仁:《典藏还是圣书?》,载《亚洲宗教历史上的经典之作》,第421—463页。

62. 见本文作者当时有关理雅各和卫礼贤的文章“攀登汉学的喜马拉雅高峰”(Scaling the Sinological Himalayas), 2005年。如今已过去了将近十年,我現在在该文中再增加另外三位传教士学者,将其加入到这令人瞩目的顶级汉学家队伍中来,他们为中国经典作品创作了俄文版、英文版、法文版、拉丁文版、德文版与葡萄牙文版领军式的经典标准翻译。

63. 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注记引自戈振东的生平年表,见豪尔赫·巴普蒂斯塔(Jorge Baptista Bruxo)著《戈振东:乌玛知识简介》(Padre Joaquim Guerra: Uma Biografia Intelectual), 澳门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第136—138页, 此处引自第136页。

64. 戈振东于1933年开始在圣约瑟夫神学院教书,于1941年在肇庆开始传教之前曾参观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地的耶稣会教会。由于战争的原因,戈振东不能在这些地方久留,其于1942年返回澳门,在圣约瑟夫神学院当了一名哲学教授。1945年和1948年,其得以重返肇庆,不过停留的时间都很短暂,直至1950年12月在肇庆被捕入狱。引自戈振东著:《戈振东神父》(Padre Joaquim Guerra), Bruxo出版中心, 第136页。

65. 随后,有关其在澳门所扮演角色的陈述均引自《戈振东神父》。这些事实在一篇介绍葡萄牙版本的《诗经》最近再版的文章中被再次提及,这个版本的《诗经》为戈振东所译。见耶稣会会士、传统主义者戈振东著:《诗经》,

澳门:葡萄牙耶稣会, 1979年, 再版于2011年, 第16页。66. 引自《戈振东神父》, 第137页。

67. 在他对这些文本的“概述”中, 他称这些文本为 the Quadrivolume de Confúcio, 即《四书》(其显然不同于宋版的《四书》), 戈振东虚心参考了之前理雅各的英文版本, 顾赛芬神父的法语版本及晁德莅(Zottoli)的拉丁语版本。晁德莅是一位19世纪在上海工作的意大利籍耶稣会会士。后来, 尽管他间或提及顾赛芬和晁德莅, 但他曾数次提到理雅各并将理雅各称为“理雅各大师”。全篇及引用部分可参见戈振东著:《戈振东神父》和释文《“四书”》(Quadrivolume de Confúcio), 澳门:葡萄牙耶稣会, 1984年, 第61—64页。

68. 第一卷为其著的《诗经》。

69. Bruxo出版中心以三卷本出版了戈振东的葡语译著《礼记》(O Cerimonial), 澳门葡萄牙耶稣会, 1988年。

70. 以下出版物的顺序在他一部作品的开头单独一页中有所强调, 这部作品为其葡译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一部作品《礼记》, 并详细列举了“同一作者的多部作品”(Obras do mesmo Autor)。

71. 值得注意的是, 这部作品题目的翻译非同寻常。戈振东非常愿意为他葡译的经典作品另寻新名, 尽管时常受限于作者和作品种类的传统称谓, 他在呈现集群性的作品时, 仍然乐于运用新的表达方式, 例如与孔子语录相关的“四合一卷”型。

72. 因为《春秋》有三本注释, 人们必须通过看原著才能确定所翻译的作品为左丘明所注, 葡译注释的题目则无法明确这一点。对于那些无法接触原著的人来说, 则可以参见《戈振东神父》第46页中的相关讨论来确认注释文本的身份。

73. 可见戈振东著: *Dicionário Chinês-Português de Análise Semântica Universal*, 澳门: 葡萄牙耶稣会, 1981年。

74. 作者和贺旦思博士(Dr. Dimitri Drettas)曾见过吴智阶(Jérónimo Hung)先生, 吴智阶现今为澳门利玛窦研究所的图书管理员, 并且曾是戈振东的学生。从先生那得知戈振东曾说他也永远也理解不了这个系统, 更别说用它了。

75. 理雅各在马六甲第二年时, 由于当时英华书院的校长约翰·埃文斯(John Evans)因病逝世, 他自动继任院长, 并完成了一本用四种语言写成的长达1111页的书《英语、马来语、汉语的词汇研究: 理解当代的福建方言和广东方言中的惯用语》, 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社, 1841年。见费乐仁著:《“人所当尽的本分”的实现》, 第1卷, 第143—145页和第260页。

76. 见费乐仁著:《“人所当尽的本分”的实现》, 第1卷, 第150—151页有所描述, 特别见第263—264页的脚注420。

77. 当时理雅各对何进善的名字没有一个统一的翻译, 所以在《大明正德皇帝游江南》(The Emperor Ching Tih in K'ang Nan: A Chinese Tale, 伦敦: 郎曼、鲍恩、格林

- 和郎曼书屋, 1843年)的英文版上写着翻译 Tkin Shen。这本书也被翻译成了荷兰语, 并于1846年出版。见费乐仁著:《“人所当尽的本分”的实现》, 第1卷, 第148—149页, 以及第262页的脚注413。
78. 见理雅各写于1872年3月13日的手稿《何进善生平简述》。该手稿现藏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CWM/South China/Personal/理雅各/Box 7)。见费乐仁著:《“人所当尽的本分”的实现》, 第1卷, 第225页脚注368。
79. 也就是说, 王韬成功考取了秀才并以其对《诗经》的研究而闻名。
80. 见费乐仁著:《“人所当尽的本分”的实现》, 第2卷, 第147、149、339—340页。
81. 英文来源见费乐仁著:《王韬与理雅各对新儒家忧患意识的回应》, 载于《历史与文化》, 第2卷, 香港, 2001年, 第1—20页。该文的中文翻译载林启彦、黄文江主编:《王韬与近代世界》, 香港教育图书公司, 2000年, 第117—147页。
82. 引自理雅各译著:《中国经典》, 第4卷前言, 第176页, 第20条。
83. 见费乐仁著:《“人所当尽的本分”的实现》, 第2卷, 第340页, 脚注413, 其中提到:“理雅各的诗经评注中有28处提到了王韬, 其中16处理雅各表示不赞同王韬的评注, 只有12处理雅各表示接受。不赞同处大多数是直接的拒绝……有几处对王韬的评注进行了再加工……还有两处的处理比再加工更为复杂……12处理雅各接受的评注, 6处是直接接受……, 另6处把王韬的评注放在了背景信息里帮助理解问题。”
84. 卫礼贤所著的书《中国灵魂》)中有劳乃宣的图片, 柏林:Reimar Hobbing Verlag, 1926年, 第224—225页第13张图。
85. 在费乐仁著:《现代儒学关于世界大同的看法:康有为的乌托邦构想和人本宗教在欧洲汉学上的折射》中, 载于托马斯·约翰逊, Thoralf Klein and Christian Meyer 主编的《全球化和中国宗教的现代化:从1800年到现在的宗教研究, 跨宗教和本土领袖》(莱顿和波士顿:布理尔出版公司, 2014年), 第235—271页, 详细说明了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
86. 见托马斯·齐默(Thomas Zimmer)的《卫礼贤:1920—1930》, 载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编:《卫礼贤:中国传教士与中国精神的传播者》(Wilhelm (1873—1930): Missionar in China and Vermittler chinesischen Geistesguts), 第17—19页。
87. 见费乐仁著:《现代儒学关于世界大同的看法》, 第257页。原文章发表于1927年4月8日的《法兰克福报》, 题为《康有为逝世》。
88. 即卫礼贤著:“K' ungtse und der Konfuzianismus”, 柏林和莱比锡:德古意特出版社, 1928年。关于卫礼贤在何处具体几次引用了两位儒家学者的观点, 详情见费乐仁著:《现代儒学关于世界大同的看法》, 第259页, 脚注72和73。
89. 更多关于儒教改革者的今文经学思想可见费乐仁著《康有为》, 载柯雄文(Antonio S. Cua)主编的《中国哲学思想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 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 2003年, 第337—341页。
90. 见费乐仁著:《现代儒学关于世界大同的看法》, 第257—230页。
91. 最早详述见费乐仁著:《从嘲笑到尊重:理雅各解释的改变——对孔子评价的提高》(From Derision to Respect: The Hermeneutic Passage within James Legge's (1815—1897) Ameliorated Evaluation of Master Kong ('Confucius')), 载于《波鸿东亚研究年鉴》, 第26卷, 2002年, 第53—88页。
92. 引自理雅各译, 《中国经典》, 第1卷, 1983年修订版, 第111页。
93. 见费乐仁著:《从嘲笑到尊重》最后一节。
94. 卫礼贤在他翻译版本的《论语》最后的“使用文献”部分对理雅各的作品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见卫礼贤译:《论语》第1版, 1910年, 第220页。
95. 卫礼贤的这类言论可见于他晚期的作品《中国灵魂》, 以及他死后出版的, 由他妻子莎尔美编辑的文集《人性与存在》(Der Mensch und Das Sein [Humanity and Being]), 德国耶拿:奥根·迪德利希出版社, 1931年。其中的某些文章, 比如《东方之神对西方复兴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astern Spirit for the western Renewal) 的第114—131页, 以及《东方之光》(Light from the East) 的第141—154页。
96. 见约阿西姆·戈振东译:《孔子四书》(Quadrivolume de Confúcio), 第62页。
97. 引自戈振东译:《孔子四书》(Quadrivolume de Confúcio), 第61页。
98. 讽刺的是, 德国汉学界常常嘲讽卫礼贤流行的作品, 见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罗梅君教授(Mechthild Leutner)的《汉学争议:卫礼贤在魏玛共和国文化批评界和学术界的地位》(Kontroversen in der Sinologie: Richard Wilhelms kulturkritische und wissenschaftliche Position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载于Hirsch编:《卫礼贤:两个世界的使节》(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第43—84页。
99.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五位传教士学者中有三位, 即理雅各、拉吉夫和顾赛芬都是从翻译朱熹作注的“四书”开始翻译中国古典经典的, 尽管理雅各翻译这四本的先后顺序和另两位不同。而卫礼贤是按时间顺序翻译的, 从《论语》到道教经典及次经典。戈振东先翻译了“五经”中三

经,然后再翻译了与孔子相关的作品。尽管以上涉及解释学的问题,并能揭示出这些汉学家兴趣的不同之处,但我们就不在此讨论了。

100. 选自克里斯托弗日报,《罗伯特·莫里森和中国的新教计划》,巴尔的摩:缪斯项目,2013年。

101. 见费乐仁著:《“人所当尽的本分”的实现》,第1卷,第99—112页。

102. 书中穿插细节详细讨论,见费乐仁著:《“人所当尽的本分”的实现》,第1卷,第187—196页。

103. 这个议题是费乐仁书中主要的主题,见《“人所当尽的本分”的实现》,第1卷,第63—86页。

104. 正如费乐仁所论证的,见《“人所当尽的本分”的实现》,第2卷,第127—132页,首先是和孟子教义的关系,他从《尚书》(第154—155页)和《诗经》(第184—185页)中的古中国一神论生发出“儒家天主教观念”,并克服了《尚书》(第174—179页)中“仅仅只有图例”和“社会传统”的翻译困难。

105. 在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中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该书于2010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由张西平和费乐仁编写中文概论。

106. 见费乐仁著:《“人所当尽的本分”的实现》,第1卷,第182—185页。

107. 选自费乐仁出版的布道书《安息日的习俗:在安息日上的三个布道,天主教安息日,殖民地的安息日》(香港中国邮政局,1850年)。他在书中对商业的贪婪性以及这种贪婪对第三次布道的影响做了辛辣的评价,见《“人所当尽的本分”的实现》,卷2,第8—10页和第268页。

108. 见理雅各译:《中国经典》,第一册,前言,1893年,第105页。

109. 因为包括理雅各有将近一千人签名反对政府支持博彩行业,所以殖民政府事实上禁止这个行业将近两年(1872—1874)。记录在香港政府的殖民文件中。

110. 在费乐仁的书中被提及,见《“人所当尽的本分”的实现》,第2卷,第122页。

111. 同上,第2卷,第202—203页。

112. 表露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东南部传教领袖寄至法国大主教的信件。

113. 在卫礼贤的著作《中国精神》(*Die Seele Chinas*)“青岛老人”的章节中被提及,第207—230页。

114. 卫礼贤在《中国精神》中简要而又戏剧化地提及这一点,第52—55页,并详尽描述在苏位智著《传教士·公正舆论·教案》,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第216—231页。

115. 简短解释见齐默著:《卫礼贤:1920—1930》,第19—20页。

116. 他尤其在他的论文“Der Mensch und Der Sein”(第114—131页)中主张“东方精神对复兴西方的重要性”。

117. 详情见戈振东译:《孔子四书》,第17—18页。

118. 见戈振东译:《孔子四书》书中用的比喻,第15页。

119. 引自戈振东译:《孔子四书》,第13页。

120. 引自戈振东为书所作的前言,戈振东译:《孔子四书》,第13页。

121. 阐述于戈振东译:《孔子四书》,第17页。

122. 最初出现于文章“从一个比较哲学的视域烦死游戏与运动的无伦理及伦理学维度”(Reconsidering Metaethical and Ethical Dimensions of Play and Sport from a Comparativ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的最后两页,载于“Orientierung”(波恩大学)2/2005,2005年12月,第1—22页。

123. 最早载费乐仁:《中国的传教士学者》(*China's Missionary-Scholars*),载于蒂德曼(R. G. Tiedemann)编辑的《中国基督教手册》(1800年至今),第2卷,莱顿、波士顿: E. J. Brill 出版社,2010年,第764—765页。

1-4. 西画来访与东方态度 谈范景中《中华竹韵》后引出的话题

本文为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日本文艺批评的文化研究”(批准号:11BWW016)的阶段性成果。

1. [日]关卫著:《西方美术东渐史》,熊得山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27页。

2. [日]熊谷宣夫著:《雪舟等杨》,东京大学出版会,1958年,第77—104页。

3. 见[比]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2010年,第4卷,第十二章。

4. 范景中著:《中华竹韵:中国古典传统中的一些品位》(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397—398页。

5. 引自关卫,第245页。

6. Ernest F. Fenollosa, *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vol. II,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3, p.106.

7. 陈继春:《澳门与西画东渐》,《岭南文史》,1997年第1期,总第41期。

8. 引自范景中著:《中华竹韵:中国古典传统中的一些品位》(下),第397页。

9. [日]大庭修著:《江户时代的日中秘话》,东京:东方书店,1980年,第50页。《几何原本》在享保五年(1720年)被容许输入日本。

10. 范景中,第399页。

11. 范景中,第400页。

12. 关卫,第300—301页。

13. 邹一桂:《小山画谱》,第2卷,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32页。

14. Ernest F. Fenollosa, *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vol. II, p.181.

15. [日]中野好夫著:《司马江汉考》,东京:新潮社,1986年,第8—9页。
16. 转自关卫,第312页。
17. Graham Reynolds, *Watercolours: A Concise Histo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71, pp.30, 90
18. 见广东省博物馆编:《异趣同辉:广东省博物馆藏清代外销艺术精品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
19. 关卫,第317页。日本于1811年在浅草始设翻译西书(荷兰语)的机构“兰书译局”,1862年改称“洋书调所”后开始工作,并将对欧洲的研究重点由荷兰语转向了英语。
20. 见[日]古田亮编《近代洋画の開拓者高橋由一》,东京:読売新闻社,2012年。
21. 见[日]岩城见一著:《感性论——为了被开放的经验理论》,王琢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09—118页;以及Paul Oskar 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t and Art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63—227. 中译文参见P.O. 克里斯特勒:《艺术的近代体系》,邵宏、李本正译,载范景中、曹意强主编《美术史与观念史》II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7—522页。
22. 见Paul Oskar Kristeller, p. 220, n.265.
23. 1896年,费氏将东京讲演以“The Nature of Fine Art”为题,发表在The Lotus杂志的三、四月号上;在这篇文章里,他寻求绘画、音乐与诗歌所共有的“synthetic quality”(见E. H. Gombrich, *The Sense of Order: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Decorative Art*, Oxford: Phaidon, 1979, pp.58—59);他又于1912年出版了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An Outline History of East Asiatic Desig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12)。
24. 姜丹书著:《美术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9月。
25. [日]中村不折、小鹿青云著:《中国绘画史》“译者赘言”,郭虚中译,正中书局,1937年,第2页。

第二单元

2-1. 林呱:“中国的托马斯·劳伦斯”

1. 老尼克(Old Nick)著:《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钱林森 蔡宏宁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作者及此著原文为Old Nick (Paul Emile Daurand Forgues), *La Chine Ouverte*, Paris, H Fourmier, 1845
2. 原文如下: ‘The Sir Thomas Lawrence of china’ 参见卡尔·克罗斯曼(Carl L. Crossman)著:《中国外销品中的装饰艺术》(*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 Suffolk,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1997, p.93
3. 小奥尔蒙德·蒂凡尼(Osmond Tiffany Jr)著:《广州的中国人或旅居天国的美国人》(*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s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and Cambridge, 1849, p.85.

4. 唐宁(C. Toogood Downing)著:《在中国的番鬼——1836—1837年》(*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1837*). London: Henry Colburn, 1838. Reprinted Shannon: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2, 第90—91页。
5. 老尼克著:《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第47页。
6. 陈继春著:《钱纳利与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年,第162页。
7. 老尼克著:《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第46页。
8. Robert Bennet Forbes, *Personal Reminiscences: To which is Added Rambling Recollections Connected with China*, Boston, Little, Brown, 1882.
9. 唐宁著:《在中国的番鬼——1836—1837年》,第90—117页。
10. 孔佩特(Patrick Conner):《林呱》(*Lamqua*). *Western and Chinese Painter*, Arts of Asia, vol.29, no.2, Mar-Apr, 1999.
11. 水天中在《“林呱”、关作霖及广东早期油画》一文中指出“此图是林呱对西方古典主义名作安格尔《大宫女》的临摹之作,但构图与原作用相反,细节也有所不同,由此可以断定林呱将《大宫女》的黑白铜版画拷贝到画布上,然后自行设色绘制。”见水天中著:《历史、艺术与人》,广西美术出版社,2001年。
12. 老尼克著:《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第45页。
13. 水天中著:《历史、艺术与人》。
14. Hong Kong Art Museum, *George Chinnery: His pupile and Influences*. Hong Kong Art Museum, 1985, p.3.
15. 见金斯曼夫人从澳门写给欧洲家人的信件(1843年12月16日),见卡尔·克罗斯曼著:《中国外销品中的装饰艺术》,第92页。
16. 唐宁著:《在中国的番鬼——1836—1837年》,第90—91页。
17. 卡尔·克罗斯曼著:《中国外销品中的装饰艺术》,第72页。
18. 同上,第80页。
19. 多米尼克·士风·李著:《晚清华洋录》,李士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20. 蒂凡尼: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s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第85页。
21. 香港艺术馆(Hong Kong Art Museum): *George Chinnery: His pupile and Influences*. Hong Kong Art Museum, 1985, p.2.
22. Albert Ten Eyck Gardner, *Cantonese Chinnerys: Portraits of How-qua and Other Ghina Trade Painters*, The Art Quarterly, Vol. XVI, winter, 1953, p.316.

23. 唐宁著:《在中国的番鬼——1836—1837年》,第90—117页。
24. 老尼克著:《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第46页。
25. 唐宁著:《在中国的番鬼——1836—1837年》,第90—117页。
26. 老尼克著:《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第43页。
27. Rebecca Kinsman Monroe, “Life in Macao in the 1840s Letters of Rebecca Chase Kinsman to her family in salem”, Essex Insti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Salem, vol.86, 1950, Letter of 16 December 1843, p.38.
28. 多米尼克·士风·李:《晚清华洋录》,彩图第12页。
29. 多米尼克·士风·李:《晚清华洋录》,第36页。
30. 《中国画家》,载1835年12月8日《广东邮报》。
31. 多米尼克·士风·李,《晚清华洋录》,第35页。
32. Albert Ten Eyck Gardner, *Cantonese Chinnery: Portraits of How-qua and Other Ghina Trade Painters*, p.316.
33. 1834年10月美国公理会派传教士伯驾至中国广州。1835年,他在广州的新豆栏街开设了一个眼科医局,为中国百姓诊治疾病,主要治疗眼科疾患。次年,为了培训助手,招收了三名中国青年生徒,关韬即其中之一。
34. 关韬,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是画家林呱的侄子。见MLa Vollee原文英译本,引自孔佩特: *George Chinnery, 1774—1852 Artist of India and the China Coast*, Suffolk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1993, p.266.
35. 多米尼克·士风·李著:《晚清华洋录》,第36页。
36. 卡尔·克罗斯曼著:《中国外销品中的装饰艺术》,第85页。

2-2. 土山湾与近代西画东渐

11 英1苏立文著:《东西方艺术的汇合》,朱伯雄译,《美术译丛》,1982年第3期。
2. 李瑞祥:《澳门——中国油画的发祥地》,《文化杂志》,1996年中文版第29期。
3. 见王镛主编:《中外美术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183页。
4. 刘汝醴:《视学——我国最早的透视学著作》,《南艺学报》,1979年第1期。
5. 万青力:《并非衰落的百年19世纪中国绘画史》,第三章“19世纪中期”中“中国西洋画之摇篮”部分,《雄狮美术》,1994年第2期。
6、21.《徐汇记略》,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14年。
7. 徐蔚南著:《中国美术工艺》,中华书局,1940年2月,第161页。
8、22.《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43年1月。
9、15、17. 张弘星:《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摇篮——上海土山湾孤儿院的艺术事业》,《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10 徐蔚南著:《中国美术工艺》,第161—162页。关于学徒的情况,该著记载:育婴堂所收异教之孩童,幼者为六七岁,大者亦不过九十岁,初授以四年之教育,如国文、习字、算术、天主教义等科,平均至十三岁,始就各童之天资性质,而授以某种工艺,至十九岁而毕业,仍留堂居住,至结婚而始离去。然堂设有工房,以供结婚后之工友寄居,所取租值则较一般为廉。因设备之周密,加以宗教信仰之关系,工友中颇多工作至老而亦不远去也。”
11. 法1史式微著:《江南传教史》,第2卷,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94页。
12. 徐蔚南著:《中国美术工艺》,第163页。
13. “土山湾画馆”之称谓收入《上海文化源流辞典》。见《上海文化源流辞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7月第18页,释为:“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传习场所。1852年(一说1862年)创立于上海,为徐家汇天主堂的附设机构之一。该画馆创立的目的是培养宗教宣传的绘画和雕塑人材,但实际上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西洋美术人才。学员的来源主要是土山湾孤儿院(亦为徐家汇天主堂附设机构)中具有美术天赋的学童。同时对外招收学员。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徐咏清、周湘、张聿光、丁悚等,均在那里学习过。担任教师者都是擅长美术的法国教士,教学方法采取工徒制,传授擦笔画、钢笔画、水彩画、油画、雕塑等技法,课堂作业大多用范本临摹。1907年该画馆出版有《绘事浅说》、《铅笔习画帖》等书籍为教材,亦向社会公开发行。”需要修正的是:一、在20世纪10年代以后,画馆的教学工作主要由法国教士负责。而在此之前,自1852年至1864年,土山湾画馆的雏形由西班牙传教士范廷佐、意大利传教士马义谷奠基;1864年至1869年由范、马二氏的学生、中国修士陆伯都主持画馆事务;自1869年至20世纪初期,画馆则由范、马二氏的另一位学生、中国修士刘德斋主持工作。二、1907年问世的《绘事浅说》、《铅笔习画帖》等书籍,由土山湾印书馆出版发行。
14. 见张弘星:《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摇篮——上海土山湾孤儿院的艺术事业》。关于该“绘画部”,该文内容为:“分素描、水彩画、油画等专业。作品主要供应全国各地之教区。另外也承接非宗教性任务。自本世纪初开始又开辟一彩绘玻璃制造部门,专供教堂及其他机构使用。”
16、20. 法1史式微著:《江南传教史》,第294页。
18. 见在沪传教士竺良仁(Indovicus Tattin)写于1845年9月15日的信。转引自法1史式微著:《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126—127页。
19. 当时上海地区设立的教堂,计有:徐家汇天主堂(旧建,1851年3月23日奠基,本年7月间竣工;新建徐家汇天主堂于1910年10月22日落成,设租界时有“法国天主堂”之称);董家渡天主堂(又称“圣沙勿略天主堂”,1853年3月20日落成,在徐家汇新天主堂未建之前,为上海最大的天主堂);老天主堂(1860年竣工);松江

- 邱家湾天主堂（1874年4月9日竣工）；虹口天主堂（又称“救世耶稣至圣三心堂”，1876年6月1日竣工）；洋泾浜天主堂（又称“圣若瑟堂”，1877年竣工）；川沙张家楼天主堂（1893年竣工）；浦东唐墓桥天主堂（1898年1月2日竣工）；南桥天主堂（竣工年代不详）；崇明大公所天主堂（1844年竣工）等。
23. 沈毓元：《土山湾与孤儿院》，载汤伟康、朱大路、杜黎编《上海轶事》，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7月，第201页。
24. 潘天寿：《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中国绘画史》附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1934年商务印书馆组编“大学丛书”，将《中国绘画史》列入再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12月重版。
25. 梁锡鸿：《中国的洋画运动》，《大光报》，1948年6月26日。
26. 丁悚：《上海早期的西洋画美术教育》，上海文史馆、上海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月，第208页。
27. 转引自张弘星：《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摇篮——上海土山湾孤儿院的艺术事业》。引文中“拿笪利”即Belgium Girolamo Nadal。其书名为：Adnotationes et Meditationes in Evangelia quae in Sacrosancto Missae Sacrificio toto anno leguntur(1595)。另，目前有学者将其书名引为《出像经解》；也有学者以为应为《主像经解》，而非《出像经解》，原因是“出”为“主”之误。
28. 见张弘星：《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摇篮——上海土山湾孤儿院的艺术事业》。参考资料有《经书总目》，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876年，等。
29. 徐悲鸿：《中国新艺术运动的回顾与前瞻》，《时事新报》，1943年3月15日。
- 30、31. 潘天寿：《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
- 32、34、35、38、48. 万青力：《并非衰落的百年19世纪中国绘画史》，第三章“19世纪中期”“中国西洋画之摇篮”部分，《雄狮美术》，1994年第2期。
33. [法]史式微著：《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222页。
- 36、37、39、46、49. 张弘星：《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摇篮——上海土山湾孤儿院的艺术事业》。
40. 姜绍书著：《无声诗史》，印晓峰点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
41. 参见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东方杂志》，1930年1月，第二十七卷第一号。
42. 方豪著：《中西交通史》，第九章“图画”第一节“利玛窦传入之西画及墨苑之翻刻”，岳麓书社，1987年12月第907页。关于该圣母子像，作者写道：“画署名唐寅作，当系伪托。顾其画与罗马圣母大殿卜吉土小堂现存圣像极似。教宗庇护第五世，曾以此像之仿作五帧赠方济各坡尔日亚（Fr.de Borgia），坡为利玛窦同时人，且同会修道，或曾转赠利氏一、二帧，则西安圣母像之由该像临摹而来，似颇可信。”
43. 谈迁著：《北游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5—46页。
44. 张弘星：《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摇篮——上海土山湾孤儿院的艺术事业》。文中提到：“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书目书上面，可以找到这幅画的照片印刷图片。”该书具体名称不详，待查。
45. 与刘德斋的油画作品《中华圣母子像》加以对照和印证的印刷品，目前能够发现的有三处：一是笔者自藏的20世纪初法国版《中华圣母子像》明信片；二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民国初期土山湾画室的历史照片；三是徐蔚南《中国美术工艺》中第七十四图“华服圣母圣子浮雕”。这三件印刷图画，都是以不同的侧面反映刘德斋《中华圣母子像》。
47. 沈之瑜：《关于任伯年的新史料》，《文汇报》，1961年9月7日。
50. 见沈毓元：《土山湾与孤儿院》，载汤伟康、朱大路、杜黎编《上海轶事》，第201页。
51. 潘天寿：《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潘天寿著：《中国绘画史》附录。
52. 梁锡鸿：《中国的洋画运动》，《大光报》，1948年6月26日。
- 53、57. 丁悚：《上海早期的西洋画美术教育》，《上海地方史资料》（五），第208页。
54. 徐悲鸿：《中国新艺术运动的回顾与前瞻》，《时事新报》，1943年3月15日。
55. 转引自朱伯雄、陈瑞林编著：《中国西画五十年》，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12月，第35页。
- 56、59. 王震：《要真正认识周湘》，《美术观察》，2000年第11期。
58. 刊于1910年9月7日《时报》。
60. 周湘：《上海油画院章程》，《民立报》，1910年12月28日。
61. 刊于1910年7月2日《申报》。
62. 刊于1910年8月5日《申报》。
63. 杨清馨著：《周湘山水画谱第三册》（画山法跋），上海卿云图书公司，1946年10月10日。
64. 刊于1911年7月2日《时报》。文中所提“宝安里”后改为锦玉里。原址今已不存。
- 65、68、69. 陈抱一：《洋画运动过程略记》，《上海艺术月刊》，1942年4月第6期。
66. 姚旭参、周叶振：《中国美术教育的前驱——周湘》，《嘉定文史研究》第八辑，第68—69页。
67. 朱伯雄、陈瑞林编著：《中国西画五十年》，第30页。关于“加西法画室”，目前尚无更为直接和具体的史料记载，需进一步查考。
70. 张充仁：《淡水彩画——京沪两地画家座谈会报导》，

《美术》，1962年第5期。

71. 72. 张修平、张贞修：《张聿光传》，载《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列》，上海文史研究馆，1993年10月。
73. 75. 徐蔚南著：《中国美术工艺》，第161—162页。
74. 《上海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同学录》，1940年10月出版（出版者不详）。目前能够查找的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原始资料甚少。该出版物仅为其中之一，且为教会范围活动的宣传品。同时，该出版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在其发展演变后期阶段的一些情况和面貌。
76. 万青力著：《并非衰落的百年：19世纪中国绘画史》，第三章“19世纪中期”“中国西洋画之摇篮”部。
77. 张弘星：《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摇篮——上海土山湾孤儿院的艺术事业》。

2-3. 宫廷的意志

王致诚画乾隆皇帝御用建福宫小三卷房床罩玻璃镜子油画考

1. 聂崇正著：《清宫绘画与“西画东渐”》，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218—219页。
2. 周苏琴著：《建福宫及其花园始建年代考》，《禁城营缮纪》，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第111—121页。
3. 同上。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1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5. 鞠德源、田建一、丁琼：《清官廷画家郎世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2月，第51页。
6. 《清官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71页。
7. 同上，第70页。
8. 鞠德源、田建一、丁琼：《清官廷画家郎世宁》，第51页。
9. [法]伯德来：《清官洋画家》，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
10. 杨乃济：《乾隆朝官廷洋乐队》，《紫禁城》，1984年4月，第42页。
11. 傅连兴、白丽娟：《建福宫花园遗址》，《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3月，第14页。
12. 杨伯达著：《清代院画》，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第234页。
13. 樊国樑著：《燕京开教略》，中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74页。

2-4. 清朝后期中国照相写实肖像画艺术研究

1. 见一可编著：《摄影术的历史：彩色插图本》，重庆出版社，2008年。
2. 同上。
3. 见章文钦著：《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东省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2009年。

4. 同上。

5. 见胡志川、陈申编：《中国早期摄影作品选(1840-1919)》，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年，前言第1页。
6. 见石春鸿著：《论摄影对西方绘画的影响》，《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20卷第4期，第63页。
7. 引自卡尔·克罗斯曼(Carl L. Crossman)著：《中国外销品中的装饰艺术》(《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 Suffolk,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1997, 第446页。
8. 泰瑞·贝内特(Terrence Bennet)著：《中国摄影史1842—1860》，徐婷婷译，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年，第42页。
9. 19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出现早期的摄影工作者，有据可考的有福建的林箴，香港的赖阿芳，广东的邹佰奇、罗森，上海的罗元佑，杭州“二我轩”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林箴是中国最早的银版摄影师（参见《清朝野史大观》卷七：《清人逸事》），广东人罗森最初是作为早期外国摄影师的助手，后又到香港独立执业照相馆（参见马运增等：《中国摄影史(1840—1937)》，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年，第21页），邹佰奇(1819—1869)是第一位独自研究摄影术及照相器材的中国人，自制了照相机和工具，并撰写《格术补》、《摄影之器记》等摄影术的著作。罗元佑于19世纪50年代起在上海开照相馆，当年是上海最有名的职业摄影师，也是在中国最早开业执镜的中国摄影师。赖阿芳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开照相馆，当年是香港第一流的摄影师。事实上这些照相馆大多数是作为商用，从1846年10月8日，香港的《中国邮报》就刊载了一则商业广告位“银版摄影和碎板印刷公司，威灵顿路，香港或中国的彩色及黑白风景照，每晨九时营业至下午三时”。现存的一幅上海摄影师Ying Cheong的广告照片，照片上有两个身着西式服装并戴着高帽的中国男孩，其中一个还佩了一杆长枪。Ying Cheong在卡片背面的宣传语中自称：“广州路上的团体照相和建筑摄影师，上海”，并且他在标签中明确地标明“出售图片”。
10. 笔者译，英文原文参见Christina H. Nelson, *Directly from China: Export Goods for the American Market, 1784—1930*, Peabody Museum, Salem, 1984: p.154.
11. 笔者译，文中涉及到的人名、作品、画楼信息参见Christina H. Nelson, *Directly from China: Export Goods for the American Market, 1784—1930*, Peabody Museum, Salem, 1984, pp.151-155.
12. 佟树珩、袁毅平、胡志川等著：《当代中国摄影艺术史》，中国摄影出版社，1996年，第2页。
13. 英文原文参见Milne, Reverend William C., MA, *Life in China*, London, G. Routledge & Co., 1857: 20. 克罗斯曼提到庭呱生于1809年，未提供出处。庭呱在广州同文街16号设有自己的画室，在19世纪40至70年代，其画室生产过大量外销风俗、风景、花鸟题材的水彩画，以线性、装饰性与较鲜艳的色彩表现为主要特征。译文参见胡光华、钱纳利与19世纪中西绘画的交流 III 《美

术研究》，2009年第2期，第20页。

14. 笔者译，英文原文参见 Christina H.Nelson, *Directly from china: Export Goods for the American Market, 1784—1930*, Peabody Museum, Salem, 1984, p31. 本文的英文原文中有“Ting-hua Isicl, son of Lamqua”，但是在后来的研究中庭呱被考证为林呱的弟弟，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庭呱是林呱的儿子”译出。

15. 国外一些文献资料中显示其名字为“Lai Sung”，他的其他油画肖像作品，如《孪生姐妹》在国外被发现时画布背后也印有“Lai Sung”字样的印章，有人译为“黎顺”，多数人未能翻译出其中文名字。笔者去年到银川当代美术馆对其《菲利普夫人肖像》进行了仔细观察鉴定，发现背框上留有墨写中文“烦交丽生收入”，以此联想推断此处的“丽生”很有可能就是“Lai Sung”的中文名，背框上留下的汉字极有可能就是当时给这幅肖像裱框的人所留；再从当时广东通商口岸的肖像画家其英文名字是由本地的口语发音得来，“Lai Sung”在粤语中，根据广东人的发音以及清代粤英词典皆可以被读作或翻译成“丽生”，与以英文名“Lam Qua”读作或译作“林呱”粤语发音的方式相同，从而确定了这幅油画《菲利普夫人肖像》的作者中文名字为“丽生”。

2-5. 文明的维度

晚清洋风画的历史及其与中国近代美术史的关系

1. [美]爱德华·V. 吉利克 (Edward V.Gulick) 著：《伯驾与中国的开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2页。
2. 事实上，特使的助手斯当东的记录是冷静的：中国皇帝同意免除英特使例行礼仪的礼节。并写道：“但许多老资格的传教士已并不感到意外。他们说，中国人虽然墨守陈规，但绝不感情用事，因此只要耐心合理地同他们交涉总可以解决问题。”（斯当东 [George Staunton] 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撒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第311页。）甚至在谒见的当天，中国皇帝乾隆也破了平时的规矩，以表达“中国政府对英国人另眼看待”（第316页）。但这些都没有阻止欧洲人对中国在18世纪末已经衰落的最终判断，尽管早在1773年由荷兰人出版的《关于埃及和中国哲学之研究》书中就有给予中国的嘲笑。书写《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的作者孟德卫 (David E.Munigello) 在他的著作中也遗憾地说：中国在种种领域的衰落直到1800年才真正显示出来。十六年后，英国又派出第二位特使安赫斯特公爵 (Lord Amherst)，这一次，因中国皇帝坚持要特使行跪拜礼及其他原因，特使没有见到中国皇帝。
3.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院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亚洲部的刘明倩 (Ming Wilson) 在广东美术馆

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联合举办的《18—19世纪羊城风物》的展览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说：

“外销画”一词是1949年之后艺术家们出于方便而杜撰的一个术语，虽然中国画工知道他们的作品是卖给洋人的，但是买家则没有将中国画分为“外销”或者“内销”的习惯。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erm ‘export painting’ only came into use after 1949, coined by art historians for the sake of convenience. In the late 18th/early 19th century Europeans made no conscious distinction between Chinese paintings made for export and those made for the home market, although Chinese artisans were indeed aware that their products were intended for foreigners.）

4. 张星烺著：《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16页。
5. 张星烺著：《欧化东渐史》，第115页。
6. 邹一桂著：《小山画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3页。
7. 这张照片被赋予的标题为（[英]《佚名中国油画家蓝阁在创作》），刘海粟将照片中的这位画家指认为钱纳利的学生关乔昌是错误的，因为60年代到达中国的汤普森已经不可能见到关乔昌，照片中的画家也许是众多被叫做“林呱”中的一个；关乔昌去世于19世纪50年代。此外，该照片的拍摄时间也晚至1870—72年期间。拍摄地点为香港，在《1860—1930 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Western Eyes: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in British Collections, 1860—1930*），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British Library），2008年，作品标题为“香港画家”。
8. 除了17、18世纪在欧洲流行的“中国风”所给予欧洲人关于中国的形象外（17世纪以来，中国丝绸、瓷器、茶叶大量进入欧洲，人们可以在瓷器和承载图像的器物例如绘画、壁纸、刺绣、漆器、服装、家具上了解中国的模样），欧洲开始于德国耶稣会教士基歇尔 (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 的《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 1667年）的版画插图对中国的描绘，也是另一个相关联的研究课题：最初，欧洲画家是通过想象去描绘中国，渐渐，他们根据文字与有限的图像，对想象的中国形象进行靠近真实的调适。彼时由于欧洲人了解中国心切，以至即便没有来过中国，也会利用比如利玛窦、卫匡国、白乃心 (Jean Grueber, 1623—1680) 等人的文字与相关资料去想象中国的模样。
9. 万青力著：《并非衰落的百年：19世纪中国绘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2-6. 中国技法与西方趣味：清中期的早期外销画

1. 详见 Donald F. Lach 的《塑造欧洲的亚洲》（*Asia in*

- the Making of Europe*), 第2卷, 第一册, 1970年, 第64页及第10页。
2. 四幅绘画中的三幅载于1596年的一份库存清单。其中两件现藏于阿姆斯特丹宫, 另两件藏于维也纳艺术历史博物馆: 详见 Roderick Whitfield 的《斐迪南大公二世藏中国绘画》(*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Archduke Ferdinand II*), 《东方艺术》(*Oriental Art*), 序列号十二, 1976年, 406—16页及第363页对页插图栏。
 3. 1611—13年仓储记录: 详见 Lach, 前引书目第15页。
 4. 李明的《回忆录及评述……作于清王朝十年游记》(*Memoirs and Remarks.. made in above Ten Years Travels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 1737年版, 信六, 第156至157页。“Curious”一词在此意味“纯熟”或“巧妙”。海盗探险家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曾于1687年抵达中国南部沿海, 他推荐在此购入漆器和丝绸, 并接着说“广东艺术家‘钻研绘画与雕刻’”。见吉瑞德·诺瑞斯(Gerald Norris)编纂:《海盗探险家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 Buccaneer Explorer*), 1994年, 第112页。
 5. 约翰·巴罗著:《中国游记》(*Travel in China*), 1804年, 第323页及第326页。
 6. 查尔斯·洛克耶著:《印度贸易账目》(*An Account of the Trade in India*), 1711年, 第125页。
 7. 同上, 第124页。
 8. 同上, 第112页。
 9. 同上, 第125页。
 10. 大英图书馆印度及东方事务部档案 G/12/6, 819。
 11. 大英图书馆印度及东方事务部档案 G/12/6, 867。
 12. 大英图书馆印度及东方事务部档案 G/12/26, 38。
 13. 大英图书馆印度及东方事务部档案 G/12/43, 72-5。
 14. 大英图书馆印度及东方事务部档案 G/12/39, 36-7。
 15. 大英图书馆印度及东方事务部档案 G/12/44, 153-6。
 16. 大英图书馆印度及东方事务部档案 G/12/36, 155。
 17. Jourdain 及 Jenyns 引用于《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 1693年3月16日至20日第25页。
 18. Emile de Bruijn, Andrew Bush 及 Helen Clifford 的《国民托管组织建筑中的中国壁纸》(*Chinese Wallpaper in National Trust Houses*), 2014年, 第3页。
 19. Margaret Jourdain 和 R. Soame Jenyns 在《中国外销绘画》(*Chinese Export Art*) (1950年, 第31页) 中引述了卡迪更伯爵的账目原稿。
 20. 大英图书馆印度及东方事务部档案 R/10/2, 见于第419至451页各处, 在此他的姓氏拼写既有 Martin 也有 Martyn。详见《莫尔斯卷一》第231至232页及第4卷第1页。东印度公司1742年至1757年在广东的记录并不完整。
 21. 见孔佩特编:《1600年至1860年的中国贸易》(*The China Trade 1600—1860*), 1986年, 第49页及第85页。
 22. 原稿收录于约克册页。齐呱 Chitqua (又名 Chetqua 或 Shykinqua) 也曾被邀请查看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大量其他中国和日本书籍, 这批书籍曾由 Kaempfer 收藏。针对一些陌生的日本材料, Chitqua 有时依靠猜测。详见 Yu-Ying Brown 的《日本书籍及手抄本》(*Japa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 前引书目第283页及289页注第19。
 23. 法国国家图书馆 Oe. 104 Res; Walter Staehlin 曾在《陶瓷之书》(*The Book of Porcelain*) (MBullock 译, 1966年) 中重制了这组插图。
 24. 《巴达维亚将军 John Maatzuyker de Badem 的大使成功述; 1655年7月20日致中国及鞞鞞皇帝》(*A Narrative of the Success of an Embassy sent by John Maatzuyker de Badem, General of Batavia; unto the Emperour of China & Tartary, the 20 of July 1655*) Nieuhof《大使团……》, 1669年, 第15页。进贡给皇室家族的礼品还包括几件据推测未经绘制的“镜子”。
 25. 1741年11月4日 Jean-Denis Attiret 致 Broissia 侯爵的信; George Loehr 将其引述于“中国宫廷的欧洲艺术家”(*European artists at the Chinese Court*), 《14至18世纪中国艺术的西方影响》(*The Westwar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Arts from the 14th to the 18th Century*), William Weston 编《亚洲艺术与考古对话录》(*Colloquies i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Asia*), 第3卷, 东方及非洲研究院, 1973年, 出版地不详。
 26. 杨伯达著:《广东对清贡品》, 北京故宫博物院及香港中文大学美术馆出版, 1987年, 第42—43页。
 27. 大英图书馆印度及东方事务部档案 G/12/44, 第153至156页。博特船长带回的其他物品有“红木椅6件”、“版画5500幅”、“四鹰瓷”、“藤竹制拐杖1000件”以及“伞4柄”。
 28. 见 Sven T. Kjellberg 著:《1731至1813年的瑞典东印度公司》(*Svenska Ostindiska Compagnierna 1731—1813*), 瑞典马尔默, 1975年, 第205页。Kjellberg 还在插图(52)中展示了派克夫人的一幅镜面绘画, 这件人物肖像也藏于同一美术馆。
 29. 保罗·范·戴克曾编写“17世纪30年代至18世纪30年代欧美记载的中国画家和绘画参考”, 但未出版。
 30. 威廉·钱伯斯爵士著:《中国建筑及家具设计》, 1757年, 注14。而在前页中, 有人认为部分中国船只的插图是“模仿一幅中国绘画的”。
 31. 威廉·钱伯斯爵士著:《萨利克佑宫花园建筑的平面、里面、剖面和透视图》(*Plans, Elevations, Sections, and Perspective Views of the Garden Buildings at Kew in Surry*), 1763年, 第2页。

第三单元

3-1. 佛罗伦萨 15 世纪版本的《会说谎的地图》 (和《城市礼赞》)

1. 请参见以下研究的参考书目：莱奥纳尔多·布鲁尼著：《佛罗伦萨城市礼赞》，佛罗伦萨：SISMEL-Edizioni del Galluzzo, 2000 年，第 XV—XXVII 页；S·U·巴尔达萨里著：《双城记：从无名的〈编年纪〉到莱奥纳尔多·布鲁尼——关于非耶索莱和佛罗伦萨城市起源的记录》（*A Tale of Two Cities: Accounts of the Origins of Fiesole and Florence from the Anonymous Chronica to Leonardo Bruni*），*Studi Rinascimentali*, 5, 2007 年，第 29—56 页；巴尔达萨里著：《有其父必有其子：关于中世纪佛罗伦萨起源的理论》（*Like Fathers like Sons: Theorie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ity in Late Medieval Florence*），*Modern Language Notes*, 124.1, 2009 年，第 23—44 页；巴尔达萨里，*La vipera e il giglio. Lo scontro tra Milano e Firenze nelle invettive di Antonio Loschi e Coluccio Salutati*, 罗马：Aracne Editrice, 2012 年，第 46—54 页及相关注释。据我所知，关于布鲁尼的《礼赞》的研究，以上参考书目中未提及的是科莫洛夫斯基（M. Komorowski）的论文《意大利联盟之前的外交类型：新大陆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布鲁尼、波焦和德琴布里奥的公民礼赞》。A. 穆达尔（A. Moudarres）和珀迪·穆达尔（C. Purdy Moudarres）编著：《对欧洲智育文化历史做出的贡献》（*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llectual Culture*），莱顿：布理尔出版社，2012 年，第 47—73 页。
2. 见马克·蒙莫尼尔著：《会说谎的地图》，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 版。蒙莫尼尔在第 1 页（第 1 章，前言）的开篇中写道：“用地图撒谎不仅很容易，而且非常重要。为了在一张平面上展现一个复杂的、三维空间词汇，地图必须放弃真实。作为一个参考模型，地图必须使用符号，这些符号几乎总是比它们所代表的地理特性大一点或小一点。为了使关键信息不被细节淹没，地图必须有选择地、部分地反映现实。我们无法摆脱制图悖论：为了让图片做到真实有效，一张精准的地图必须撒一些善意的谎言。”
3. “历史是一回事”，布鲁尼说，“颂词是另一回事。历史必须遵循事实，颂词赞颂的东西很多都超于事实”。引自 J·汉金斯著：《修辞、历史和神学：公民人文主义盛行时莱奥纳尔多·布鲁尼的公民颂词：重新评价和反应》（*Rhetoric, History, and Ideology: The Civic Panegyrics of Leonardo Bruni, in Renaissance Civic Humanism: Reappraisals and Reflections*）的英译本，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43—178 页，特别是第 161 页。原文请参见梅休斯（L. Mehus）编著的 *Epistolarium libri VIII*, II, 佛

- 罗伦萨：Paperini 出版社，1741 年（凸版再版，附汉金斯的前言，罗马：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出版社，2007 年），第 112 页。另参见第 111 页，布鲁尼在此处写道，他认为《礼赞》是一个不成熟的作品。写给皮佐帕索的全信内容见第 110—115 页。顺便一提，针对布鲁尼《礼赞》的批评多来自米兰读者，众所周知，从 1390 年到洛斯基统治末期的 1447 年，佛罗伦萨和米兰几乎一直处于战争中。15 世纪 30 年代中期，米兰的人文主义者德琴布里奥发表了一篇米兰颂词，作为对布鲁尼作品的回应；同样地，对此我们也需感到惊讶。关于德琴布里奥的 *De laudibus Mediolanensium urbis in comparationem Florentiae panegyricus*，参见本人编著的《礼赞》（*Laudatio*），第 XXVI 页和里面列举的参考书目。另参见科莫洛夫斯基的《外交类型》（*The Diplomatic Genre*），特别是第 53—62 页。
4. 关于 15 世纪佛罗伦萨的景观和地图，包括马萨约和罗塞利的作品，参见以下研究和其中的参考书目：沙里尼（M. Charini）和马拉博蒂尼（A. Marabottini）编著：*Firenze e la sua immagine: cinque secoli di vedutismo*，威尼斯：Marsilio, 1994 年；Strofolino 的 *La città è misurata. Tecniche e strumenti di rilevamento nei trattati a stampa del Cinquecento*，罗马：Salerno Editrice 出版社，1999 年；努蒂（L. Nuti）的 *Cosmografia senza carte. Lo spazio urbano descritto dal Medioevo al Rinascimento*，米兰：Jaca Book 出版社，2008 年；德塞塔（C. De Seta）的 *Ritratti di città. Dal Rinascimento al secolo XVIII*，都灵：Einaudi, 2011 年。
 5. 引自本杰明（Benjamin G. Kohl）的《礼赞》的英译本，出自 BG. Kohl, R.G. Witt 和 EB. Welles 编著的《地球上的共和国 - 关注政府和社会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The Earthly Republic. Italian Humanists on Government and Society*），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78 年，第 135—175 页。起始段落见第 135 页。
 6. 顺便一提，与布鲁尼同时代的佛罗伦萨人莫雷利在回忆录里赞颂穆杰罗山谷时也使用了相同的修辞技巧。见巴尔达萨里和塞伯编著：《15 世纪佛罗伦萨的图片。关于文学、历史和艺术的精选集》，纽黑文市：耶鲁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56 页：“从穆杰罗公民身上可立即看到这里的美，他们即使都是农民，但都谦逊有礼、诚实可靠。女人们漂亮、友好、开朗、热情。可爱，随时随地都可载歌载舞。全年中，（从佛罗伦萨来的）贵族公民来穆杰罗山谷捕猎，举行高雅的聚会，整片地区充满了欢歌笑语。”我将在论文的第二部分再次提及这篇日志。
 7. 布鲁尼著：《礼赞》，第 136 页。
 8. 关于《佛罗伦萨城市礼赞》对意大利和国外的城市颂词的影响，参见我的评述版，第 XXIII—XXVII 页。
 9. 布鲁尼著：《礼赞》，第 140 页。这也将成为赞颂 15 世纪佛罗伦萨文体中的常见特征（包括拉丁文和意大利文）。

10. 布鲁尼著：《礼赞》，第137页。
11. 见巴尔达萨里著：《La vipera e il giglio》，第16页（拉丁文版的24—25段）。关于萨卢塔蒂作品里的这一段文字，参见我在注释1里提及的研究，此外还有：“Le città possibili: arte e filologia nel dibattito sull’ origine di Firenze da Giovanni Villani a Leonardo Bruni”，出自*Proxima Studia*：“arte e letteratura a Firenze (1300—1600)”。*Convegn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Palazzo Rucellai, 21-22 ottobre 2008)*，巴尔达萨里编著：《文学和艺术》(*Letteratura & Arte*)，9，2011年，第23—41页。
12. 以下内容摘自《15世纪佛罗伦萨的图片》里关于这段文字的英译文，引自第9—10页：“关于城市的创建者，有证据可明确证明佛罗伦萨由罗马人创建。佛罗伦萨的中央建有一栋国会大厦，它的右边有一个公共广场；还有一个所谓的竞技场、名为 Terme 和 Capacia 的地方以及一个叫做 Parione 的地段。这里有一座曾供奉战神的寺庙，异教徒们认为他是罗马人之父。必须提出的是，这座寺庙的风格既非希腊风，又非伊特鲁利亚风，而是十足的罗马风。我还想提一下另一个可证明我们起源于罗马人的东西，尽管它已不复存在——耶稣（上帝和人类之间的中保）化成肉身以后，一直到14世纪30年代以前，韦奇奥宫中都保存有一座战神骑马的塑像。人们将其视为自己纯正的罗马人血统的证据保存了起来，但在70年前的11月4日那天，洪水冲垮了佛罗伦萨的三座桥梁，也冲走了这座雕像。现在还活着的人曾见过它并对它有印象。直至今今，可看到当时留下的拱桥和其他水利工程的遗址。这些古罗马风格的建筑曾被当作公共设施为城市供水。所有这些罗马遗迹、罗马地名和古人风俗习惯还有待人们发现，它们是证明我们拥有优良的罗马人血统的有力证据，谁敢否认这些作品不是出自罗马人之手呢？圆塔和城门遗址现在属于主教宫殿的一部分，每一个见过它们的人，不仅不会怀疑，事实上，它们会愿意发誓，是罗马人建造了这些东西——不仅因为使用的材料，即瓦片和砖块，还因为它本身所具有的风格。”关于这段文字的文献记载，可参见巴尔达萨里的《毒蛇与百合》(*La vipera e il giglio*)，引自第25—26页和第104—105页。还可参见巴尔达萨里的“Prime ricerche per un’ edizione critica della *Invectiva in Antonium Luscum*”，《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Medioevo e Rinascimento*)，22(2008年)，第105—129页，特别是第113—114页。萨卢塔蒂回复洛斯基的完整英译本即将出版，属于巴尔达萨里编著：“I Tatti Renaissance Library”系列书的其中一册：萨卢塔蒂：《政治论》，巴格米尔翻译，剑桥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
13. 见布鲁尼：《佛罗伦萨人民史》，引自《15世纪佛罗伦萨的图片》，第14—16页，以及詹姆斯·汉金斯(James Hankins)编著：《佛罗伦萨人民史》，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1，第10—15页(14-7)。关于吉贝尔蒂和阿尔贝蒂，参见两段重要摘要，收录在《15世纪佛罗伦萨的图片》，第189—191页和第193—194页。
14. 引自布鲁尼著：《礼赞》，第138—139页。
15. 同上，第139—140页。
16. 关于罗塞利的《带链子的地图》和卢坎托尼奥·阿尔贝蒂(Lucantonio Alberti)的读后感，参见以下研究及其参考书目：Strofolino, *La città misurata*, 145—146页；S. Boorsch, “The Case for Francesco Rosselli as the Engraver of Berlinghieri’s Geographia”，《世界宝鉴》，562，2004年，152—169页；德塞塔(Ritratti), 13—25页。
17. 引自布鲁尼著：《礼赞》，第144—145页。
18. 同上，第137页。
19. 同上，第140—141页，布鲁尼在此处写道：“因此，就像血液流遍整个身躯一样，优美的建筑和装饰也遍布整座城市。”
20. 同上，第141—142页，布鲁尼在此处做出以下结论：“因此，整片地区应当被视为和称为天堂——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如它优雅美丽。”
21. 巴尔达萨里和菲廖罗(B. Figliuolo)编著：‘*Manettiana*’。La biografia anonima in terzine e altri documenti inediti su Giannozzo Manetti 中有关马内蒂 De dignitate et excellentia hominis 的参考书目，罗马：Roma nel Rinascimento 出版社，2010年，第133—134页(107—108页的注释)。
22. 参见马内蒂的 *De dignitate et excellentia hominis*，伦纳德(E. Leonard)编著，帕多瓦：Antenore，1975年，III20-21，第77—78页。
23. 《15世纪佛罗伦萨的图片》的英译文，第57页。
24. 见杜瓦尔·阿尔努(A. Duval-Arnould)的 *Les manuscrits de la “Géographie” de Ptolémée issus de l’ atelier de Piero del Massaio (Florence, 1469—1478)*，出自 *Humanisme et culture géographique à l’ époque du Concile de Constance. Autour Guillaume Fillastre. Actes du colloque de l’ Université de Reims (18-19 novembre 1999)*，马科特(D. Marcotte)编著，蒂尔蒙特：Brepols 出版社，2002年，第228—244页。
25. 参见真蒂莱(S. Gentile)的 *Emanuele Crisolora e la “Geografia” di Tolomeo*，出自科尔泰西(M. Cortesi)和马尔泰赛(EV. Maltese)编著：*Doti bizantine e libri greci nell’ Italia del secolo XV*，1992年，第291—308页；真蒂莱编著：*Firenze e la scoperta dell’ America. Umanesimo e geografia nel ‘400 fiorentino*，佛罗伦萨：Olschki 出版社，1992年，特别是第77—80页和第92—98页。戈蒂埃·达尔谢(P. Gautier Dalché)的专题著作 *La Géographie de Ptolémée en Occident (Ive-XVIe siècle)*，蒂尔蒙特：Brepols 出版社，2009年。
26. 关于 Zibaldone 参见《15世纪佛罗伦萨的图片》第331页提到的参考书目。还可参见巴蒂斯塔(G. Battista)的

Giovanni Rucellai e il suo "Zibaldone", 出自 "Proxima Studia", 第 43—70 页。

27. 《15 世纪佛罗伦萨的图片》的英译文, 第 74—75 页。

28. 同上, 第 86 页。整篇文章引自 84—87 页。关于 Dei 的参考书目同上, 第 332 页。

29. 引自《15 世纪佛罗伦萨的图片》中 Theotocon 片段的英译文, 第 248—251 页。参见洛伦佐·阿马托 (Lorenzo Amato) 关于这段文字的评述 (罗马,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2012 年)。

30. 《15 世纪佛罗伦萨的图片》的英译文, 第 248—249 页。

31. 《15 世纪佛罗伦萨的图片》的英译文, 第 194 页。关于阿尔贝蒂的参考书目数量庞大且一直在增多。就这一论述而言, 可参见博斯科托 (L. Boschetto) 的 *Alberti, gli artisti, il volgare*, 出自 "Proxima Studia", 第 71—81 页; 文章篇幅虽短但信息量大 (同样提供丰富的参考书目)。

32. 参见马内蒂的 *De dignitate*, II.38, 第 59 页。

3-2. 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神学、宇宙学和世界地图绘制学

本文描述的是由葡萄牙科学技术基金会负责的“竞争双方的相互作用: 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团和佛教宗派 (约 1549—约 1647)” 课题的研究内容。

1. 汾屠立神父编: 《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adre Matteo Ricci, SJ*) 的第二卷《中国来信》(*Le lettere dalla Cina*, 马切拉塔: Giorgetti, 1913 年); 德礼贤神父编: 《利玛窦全集: 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和基督教传入中国史》(*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 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第三卷, 罗马: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49 年; 达仁理编: 利玛窦的《中国来信》(1580—1609), 马切拉塔: Quodlibet, 2001 年。

2. “西方的地图绘制学” 指的是根据欧洲人掌握的知识, 描绘出欧洲、非洲、亚洲和所谓“新世界”。地图通常绘于托勒密坐标方格上, 周围有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宇宙原理图。

3. 利亚姆·马修·布洛奇 (Liam Matthew Brockey) 著: 《东游记: 1579—1724 年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团》(*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剑桥, 马萨诸塞州: 哈佛大学贝拉纳普出版社, 2008 年, 第 243—96 页; Chen Minsun 著: “南怀仁以及 1584 年—1674 年耶稣会士绘制的中国地理作品”, 约翰·W·威特克 (John W. Witte) 编: 出自《耶稣会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和外交家——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Jesuit Missionary, Scientist, Engineer and Diplomat*), 圣奥古斯丁和勒芬: 华裔学志研究所/南怀仁基金会, 1994 年, 第 123—33 页。关于欧洲早期

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完整记述, 请参见 *A construção do conhecimento europeu sobre a China, c.1500—c.1630: Impresses e manuscritos que revelaram o mundo chinês à Europa culta*, 共两卷, 作者弗朗西斯科·罗克·德奥利韦拉 (Francisco Roque de Oliveira) 于 2003 年获得巴塞罗那大学的神学博士学位。(<http://www.tdx.cesca.es/TDX1222103-16016/>)。

4. 玛格丽塔·雷达埃利 (Margherita Redaelli), *Il Mappamondo con la Cina al centro. Fonti antiche e mediazione culturale nell' opera di Matteo Ricci SJ*, 比萨: Edizioni ETS 出版社, 2007 年, 第 63—97 页。

5. 金尼阁著: 《耶稣会进行基督教在中国的远征》(*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Jesu*), 第二卷第六章, 奥格斯堡, 1615 年, 第 182—185 页。

6. 德礼贤神父著: *Il mappamondo cinese del P. Matteo Ricci SJ (Terza edizione, Pechino, 1602), conservato presso la Biblioteca Vaticana.*, 梵蒂冈: 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出版社, 1938 年, 第 73—93 页; 德礼贤神父, “关于利玛窦神父的中文世界地图的最新发现和研究 (1938—1960)”, 《华裔学志》, 20 (1961 年), 82—164; 西奥多·N·福斯 (Theodore N. Foss), “利玛窦的地图”, M·奇利亚诺 (M. Cigliano) 编,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ricciani (Macerata-Roma, 22 - 25 ottobre 1982)* (马切拉塔: Centro Studi Ricciani, 1984 年), 第 177—196 页;

西奥多·N·福斯著: “耶稣会士的地图绘制学——西方对于中国的解读”, 查尔斯·E·罗南 (Charles E. Ronan) 和 Bonnie BC Oh 编: 《东西方的碰撞——耶稣会士在中国》(*East Meets West: The Jesuits in China, 1582—1773*) (芝加哥: 洛约拉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第 209—251 页; 约翰·D·戴 (John D. Day), “寻找利玛窦地图的中文原稿”, 《世界宝鉴》, 47 (1995 年), 第 94—117 页; M·德贝格 (M. Debergh), “La Carte du monde du P. Matteo Ricci (1602) et sa version coréenne (1708) conservée à Osaka”, 《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 274 (1981 年), 第 417—54 页; 安·赫尔曼 (Ann Heirman)、保罗·德特罗亚 (Paolo De Troia) 和让·帕尔芒捷 (Jan Parmentier), “毕芳济——中国制作的欧洲地图中被遗漏的人物?”, 《世界宝鉴》, 61/1 (2009 年), 29—46。

7. 马赛尔·德东布 (Marcel Destombes): “王洋、Liang Chou 和利玛窦: 分析 1593 年至 1603 年中文地图”, 见 *Appréciation par l' Europe de la tradition chinoise à partir du XVIIe siècle: Actes du IIIe Colloque Internationale de Sinologie* (巴黎: Les Belles Lettres, 1983 年), 第 47—65 页; 科德尔·D·K·伊 (Cordell DK Yee), “中国传统制图学和西化谎言”, 出自 J·B·哈利 (JB Harley) 和大卫·伍德沃德 (David Woodward) 编: 《地图绘制学历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第二卷第二册《东亚和东南亚社会的传统

- 制图学》(*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Societies*)，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0—202页；洛德瑞希·普塔克(Roderich Ptak)，“百科全书*Sancai tuihui*里的中欧地图(“上海舆地全图”)”，出自*Actas do Colóquio Internacional de Estudos O Humanismo Latino e as Culturas do Extremo Oriente*，澳门，2005:16-8(波尔图，Cítedra Humanismo Latino，2005年) <http://www.humanismolatinoonlinept/vl/pdf/CO03-022.pdf>；陈慧宏，“被作为宇宙的人类身体：通过耶稣会制图学在中国的具体化和敏感性来理解天堂”，《天主教历史评论》(*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93/3(2007年)，第517—5，852页。
8. 达仁理，“Matteo Ricci S.I. Le “cose absurde” dell’ astronomia cinese: genesi, eredità ed influsso di un convincimento tra i secoli XVI - XVII”，出自I·杨纳科(I. Iannaccone)和A·塔姆布雷罗(A. Tamburello)编著的*Dall’ Europa alla Cina: contributi per una storia dell’ Astronomia*，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5—123页。
9. 加里·莱德亚德，“朝鲜的地图绘制学”，出自J·B·哈利(J.B. Harley)和大卫·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编著的《地图绘制学历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第二卷第二册《东亚和东南亚社会的传统制图学》(*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Societies*)，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44—49页、第265—67页、第284页和第289—91页。
10. 关于《疆理图》的最新研究成果，请参见宫纪子的《蒙古帝国制作的世界地图》；参见安吉洛·卡塔内奥，“Il lungo viaggio della cartografia universale attraverso il mondo islamico, la Cina, la Corea e il Giappone (sec. XIV - XVI). Studio dell’ carta universale Honil kangni yöktae kukto chi to (Corea, c. 1479 - 85) in una prospettiva comparata”，出自安杰利洛编著的*Culture, religioni e diritto nelle società à dell’ Asia Orientale*，罗马：Bulzoni，2010年，第177—200页。
11. 伊，“中国传统制图学”，第170—202页。
12. 汾屠立神父编著，*Opere storiche del Padre Matteo Ricci, S.I.*，第1卷Commentari della Cina，马切拉塔：Giorgetti出版社，1911年。
13. 利玛窦手稿最近得以再版：*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 e Christianita nella Cina*，皮耶罗·科拉迪尼编著，马切拉塔：Quodlibet出版社，2000年。
14. 德礼贤神父，《利玛窦全集》，第1卷，第208页。
15. 柯毅霖神父，“利玛窦的传教方式”，*Tripod* (2010年秋季)，第30/158页，《利玛窦诞辰400周年纪念日》。
16. 伊莎贝尔·穆尔塔·碧娜(Isabel Murta Pina)，*Jesu í tas Chineses e Mestiços da Missão da China*，里斯本：CCCM，2012年。
17. 乔治·曼加尼，“Misurare, calcolare, pregare. Il mappamondo ricciano come strumento meditativo”，出自米尼尼(F. Mignini)编著：*L’ Europa alla corte dei Ming, Catalogo dellamostra (Macerata, luglio ottobre 2003)*，米兰：Mazzotta，2003年。重印收录在曼加尼的*Cartografia morale, Geografia, persuasione, identità*摩德纳：F. Cosimo Panini，2006年，第123—134页。
18. 陈慧宏著：“作为宇宙的人体”，第537—541页。
19. *Cieli e terre nei secoli XI - XII. Orizzonti, percezioni, rapporti. Atti della tredicesima Settimana internazionale di studio, Mendola, 22 - 26 agosto 1995* (Milan: Vita e pensiero, 1998). See in particular R. Grégoire, ‘Semantica del cielo e della terra nell’ esegesi biblica medievale’，3 - 29; A.-D. von den Brincken, ‘Mappe del Medio Evo: mappe del cielo e della terra’，51 - 73; J. Verger, ‘Ciel et terre dans l’ enseignement des “artes”’，111 - 133; M.L. Meneghetti, ‘Cielo e terra nel romanzo cortese’，179 - 195; P. Dinzelsbacher, ‘Voli celesti e contemplazione del mondo nella letteratura estatico-visionaria del Medioevo’，215 - 259; and P. Tomea, ‘Rappresentazioni e funzioni del cielo e della terra nelle fonti agiografiche del Medioevo occidentale’，311—349.
20. 雅克·勒戈夫(Jacques Le Goff)，*L’ immaginario medievale*，出自《*Lo spazio letterario del medioevo*》第4卷，*L’ attualizzazione del testo*，罗马：Salerno Editrice，1998年，第20页。
21. *Cahiers V.-L. Saulnier* [26] 2009: Actes du colloque ‘Les méditations cosmographiques à la Renaissance’，J.-M. Besse, M.-D. Couzinet和F. Lestringant编。参见帕特里克·戈蒂埃·达尔谢(Patrick Gautier Dalché)，“Pour une histoire des rapports entre contemplation et cartographie au Moyen Age”，第19—40页；安吉洛·卡塔内奥(Angelo Cattaneo)，“Cosmographie et prédication médiévale et renaissance”，第57—70页；让马克·贝斯(Jean-Marc Besse)，“结论”，第197—204页。
22. 胡安·卡萨诺瓦(Juan Casanovas)，“Alle origini del missionariato scientifico nell’ Asia Orientale: Clavio e il Collegio Romano”，出自I. Iannaccone和A. Tamburello编著的*Dall’ Europa alla Cina: contributi per una storia dell’ Astronomia* (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5—84页；乌戈·巴尔蒂尼(Ugo Baldini)，*Legem impone subactis: studi su filosofia e scienza dei Gesuiti in Italia: 1540—1632* (罗马：Bulzoni，1992年)，第15—89页；安东内拉·罗马诺(Antonella Romano)，*La Contre-réforme mathématique: constitution et diffusion d’ une culture*

mathématique jésuite à la Renaissance (1540—1640) (罗马: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1999年), 第43—85页。

23. 威廉哈里斯 (William Harris Stahl), “马克罗比乌斯的天文学和地理学”, 《美国语言学会的汇报和记录》(*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Society*), 35 (1942年), 第232—238页。

24. 德礼贤神父, *Il Mappamondo cinese*, 170—171; 陈慧宏, “作为宇宙的人体”。第537—541页。

25. Giuseppe Caraci, “Nuovi studi sull’ opera cartografica del P. Matteo Ricci”, *Rivista geografica italiana*, 47 (1940), 第25—45页, 第124—173页。

26. 乔治·曼加尼, *Il ‘mondo’ di Abramo Ortelio: Misticismo, geografia e collezionismo nel Rinascimento dei Paesi Bassi* (摩德纳: Franco Cosimo Panini, 1998年; 2006年第2版); 乔治曼加尼, “La signification providentielle du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出自《亚伯拉罕·奥特柳斯: 制图学家和人文主义者》(*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 Cartographe et humaniste*) (蒂伦豪特: Brepols, 1998年), 第93—104页。

27. “Quid ei potest videri magnum in rebus humanis, cui aeternitas omnis, totiusque mundi nota sit magnitudo”, 西塞罗, *Tusculanas disputationes*, 第417.37页。

28. “Equus vehendi causa, arandi bos, venandi et custodiendi canis, homo autem ortus ad mundum contemplandum”, 西塞罗, *De natura Deorum*, 第2.37页。

29. 这个观点引自普林尼的《自然历史》: “Hic est mundi punctus et materia gloriae nostrae, hic sedes, hic honores gerimus, hic exercemus imperia, hic opes cupimus, hic tumultuatur humanum genus, hic instauramus bella, etiam civica”; 参见老普林尼的 *Naturalis historia*, 第2册, 第72章。

30. 钟鸣旦写道: “《神操》第一次冥想开始时, 圣依纳爵建议人们应该‘看着这个地方’, 他称这个为‘序曲’或准备‘组合’。他这样描述这个过程: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 沉思或冥想有关有形的东西, 例如, 在沉思我们的耶稣(可见的)时, ‘组合’将借助想象力。我指的是安放了耶稣或圣母玛利亚的寺庙或山——根据我想要沉思的对象。如果对象是无形的, 就像关于罪恶的沉思那样, 将要发挥想象, 自己的灵魂被囚禁在身体里, 某天将与身体分离。钟鸣旦, “地方的组合: 为相遇创造空间”, *The Way*, 46/1 (2007年1月), 7-20 (7-8)。参见米歇尔·德塞都 “L’ espace du désir ou le ‘fondement’ des Exercices spirituels”, 《耶稣》(Christus), 77 (1973年), 第118—128页; 皮埃尔·安东尼·法布尔 (Pierre-Antoine Fabre), *Ignace de Loyola: Le Lieu de l’ image: Le problème de la composition de lieu dans les pratiques spirituelles et artistiques jésuites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 巴黎: Vrin, 1992年。

31. 圣依纳爵著: 《神操》, 罗马: IHSI, 1969年, 第222—225页。

3-3. 中国早期摄影 对象、身份、动机和商业需求

1. 想了解更多乔治·韦斯特的生平, 请参见作者的《1842年—1860年的中国摄影历史》(*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1842—1860*), 伦敦: Quaritch, 2009年, 第9—15页。
2. 更多贝亚托的1860年鸦片战争时期的照片请参见哈里斯 (Harris) 和大卫 (David) 的《战争与美丽: 菲利斯贝亚托的中国照片》(*Battle and Beauty: Felice Beato’s Photographs of China*), 圣巴巴拉: 圣巴巴拉艺术博物馆出版社, 1999年。
3. 参见作者的《中国摄影历史: 1844年—1879年的中国摄影师》, 第311—324页。
4. 关于坎米奇的生平和职业生涯, 请参见作者的《中国摄影历史: 1861年—1879年的西方摄影师》(*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Western Photographers 1861—1879*), 伦敦: Quaritch出版社, 2010年, 第123—132页。
5. 同上, 第56—78页。
6. 参见作者的《中国摄影历史: 1844年—1879年的中国摄影师》中“摄影在福州”一章, 第149—214页。
7. 你可以在“梦周文教基金会中国早期摄影藏品”、香港和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2009.167)看到黎芳(阿芳照相馆)的摄影作品。洛杉矶的盖提研究所(2003.R.22, box 5)、哈佛燕京图书馆和爱德华·班斯·德鲁 (Edward Bangs Drew) 藏品 (EBD06) 收藏有同兴的摄影作品。
8. 见卡尔·L·克罗斯曼著: 《中国贸易的装饰艺术: 画作、家具和异国古玩》(*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 Paintings, Furnishings and Exotic Curiosities*), 伍德布里奇: Antique Collectors’ Club出版社, 1991年。
9. 克罗斯曼著: 《中国贸易的装饰艺术: 画作、家具和异国古玩》, 第151—155页。
10. 乔治·亨利·普雷布尔著: 《打开国门的日本: 1853年—1856年的远东探索日记》(*The Opening of Japan: A Diary of Discovery in the Far East, 1853-1856*), 诺曼: 奥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 1962年。
11. 约翰·汤姆森的“香港摄影师” (Hong-Kong Photographers), 《英国人的摄影日志》第19期, 656号, 1872年11月29日, 第569页。
12. 大卫·诺克斯·格里菲斯的“天朝照相馆” (A Celestial Studio), 《摄影新闻》第19期, 873号, 1875年5月28日, 第259—260页。
13. “东亚的摄影”, 《摄影新闻》, 第28期, 1330号, 1884年2月29日, 第129页。

14. 约翰·汤姆森著：《马六甲海峡、印度支那半岛和中国——十年国外旅行、探险和定居生涯》（*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or Ten Years' Travels, Adventures and Residence Abroad*），伦敦：Sampson Low, Marston, Low & Searle 出版社，1875年（189—190页）。在1899年出版的《带着相机游中国》（*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伦敦：Harper & Brothers，第32页）一书中，汤姆森补充道，中国人讲究对称还体现在“他们一般带着两块怀表，大衣两边各挂一个”。

15. 作者在他的《中国摄影历史：1844年—1879年的中国摄影师》一书后附上了150张肖像照复制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摄影师在中式和西式肖像摄影之间变换自如的能力。《中国摄影历史：1844年—1879年的中国摄影师》（*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Chinese Photographers 1844—1879*），伦敦：Quaritch 出版社，2013年，第291—310页。

16. “东亚的摄影”，第129页。

17. 约翰·雷迪·布莱克编《远东》（*The Far East*），上海，新系列，第3期，3号，1877年9月，第69页。照片未署名，但很可能是公泰。

18. 艾萨克·泰勒·黑德兰（Headland, Isaac Taylor）的“中国的摄影”（“Photography in China”），《英国人的摄影日志》（*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第48期，2173号，1901年12月27日，第822—823页。

19. 约翰·汤姆森，《马六甲海峡、印度支那半岛和中国——十年国外旅行、探险和定居生涯》，第188—189页。

20. 想要了解照相馆之间打价格战的背景以及威廉·弗洛伊德的职业生涯，请参见作者著《中国摄影历史：1861年—1879年的西方摄影师》，伦敦：Quaritch 出版社，2010年，第7—18页。

21. 约翰·古利克和塞缪尔·布朗是在日本的美国传教士，他们在工作之余练习摄影。古利克利用摄影技术赚钱，这在传教士中很少见。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作者的“约翰·托马斯·古利克（1832—1923）——日本的先驱摄影师”（“John Thomas Gulick - Pioneer Photographer in Japan”），《泛亚摄影评论》（*Trans-Asia Photography Review*），第1期，2号，2011年春季（电子杂志）。

22. 《1842年—1860年的中国摄影历史》里简略地提到过柯林斯的作品。第117页。

23. 乔斯林的相关信息同上（第129—139页）。

24. 托马斯·莱尔德有趣的职业生生涯在《中国摄影历史：1861—1879年的西方摄影师》里有详细记载。《中国摄影历史：1861—1879年的西方摄影师》，第56—78页。

25. 内容见于《中国摄影历史：1861—1879年的西方摄影师》，第70页。

26. 参见“北京”，《皇家艺术协会期刊》，第43期，1895年2月1日，第219页。

27. 相册是作者的收藏品。

28. 参见由哈特的代理人保管的日志参考资料，这位代理人曾去宁波和上海之间的乡村地区购买丝绸，这片地区后来被太平军所占领。他在日志里写道，太平军对他很友善，被太平军占领的地区都一派太平景象。英国议会曾对本日志进行过讨论，然后重新考虑了对待太平军和清政府的立场。英国议会议事录：下议院1963年7月6日，第172期，第270—330页。日志之后又出现在威廉·亨利·赛克斯（William Henry）的《中国的太平军起义》（*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一书中。《中国的太平军起义》，伦敦：Warren Hall & Co. 出版社，1863年。

3-4. 丝绸之路与14至17世纪的东西方地图交流

* 本文系系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专项基金项目“陕西古代地图的调查、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2JK0178）资助研究成果。

1. Walter Fuchs, Drei neue Versionen der chinesisch-koreanischen Weltkarte von 1402, H. Franke hgg. Studia Sino-Altaica, Festschrift fuer Erich Haenisch zum 80, Wiesbaden, 1961, pp.75-77; (德) 福克司：“Notiz zur Pekinger Weltkarte der Ming-Zeit”，織田武雄译：《北京的明代世界图について》，《地理学史研究》第2辑，1962年；汪前进、胡启松、刘若芳：《绢本彩绘大明混一图研究》，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卷），第51—55页。刘若芳、汪前进：《〈大明混一图〉绘制时间再探讨》，《明史研究》2007年第10辑，第329—355页；周运中：《〈大明混一图〉中国部分来源试析》，刘迎胜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00—119页；席会东：《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年，第76—79页。

2. Walter Fuchs, Drei neue Versionen der chinesisch-koreanischen Weltkarte von 1402, pp.75-77; 張保雄：《李朝初期, 15世紀において製作された地図に関する研究》，《地理科学》1972年第16号，第1—9页；宮紀子：《〈混一疆理歴代国都之図〉への道——14世紀四明地方の“知”の行方》，藤井讓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編：《繪図・地図からみた世界像》，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多元的人文の拠点形成15・16・17世紀成立の繪図・地図と世界観》，2004年，第3-130頁；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宮紀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図》，東京：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7年；杉山正明：《東西の世界図が語る人類最初の大地平》，藤井讓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編：《大地の肖像——繪図・地図が語る世界》，京都：京都大学学

- 術出版会, 2007年, 第54—83页; 杨晓春:《〈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相关诸图间的关系——以文字资料为中心的初步研究》, 刘迎胜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 第76—99页; 李孝聪:《传世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 刘迎胜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 第164—184页。
3. (法) 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4年。朱鉴秋:《〈郑和航海图〉之基本特点》,《中国航海》1984年第1期, 第85—97页; 朱鉴秋:《〈郑和航海图〉简述》,《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第50—55页; 严敦杰:《释〈郑和航海图〉引言》,《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 第1—63页; 张箭:《〈郑和航海图〉的复原》,《四川文物》2005年第2期, 第80—83、101页; 洪振权:《郑和航海图今析》,《航海》2005年第3期, 第11—15页; 杨晓虹:《述评: 世界现存最早的海图档案——〈郑和航海图〉》,《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2期, 第91—93页; 周运中:《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期, 第145—152页; 黄盛璋:《〈过洋牵星图〉起源阿拉伯与中国发展、提高的贡献指迷解疑》, 刘迎胜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 第120—163页; 朱鉴秋:《解密〈郑和航海图〉》,《地图》2012年第5期, 第116—123页。
4. (明) 赵廷瑞修, 马理、吕柟纂:《陕西通志》, 董健桥等据陕西三原县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刻本点校,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年, 第488—489、510页。李之勤:《西域史地三种资料校注》之《西域土地人物略校注》,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40、44—45、47页。
5. 卢雪燕:《一带山河万里墙——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明彩绘本〈甘肃镇戍守图略〉》,《故宫学季刊》2009年第26卷第3期, 第71—103页; 卢雪燕:《〈甘肃镇戍守图略〉——一本兼具美感与军防的明代边防图册》,《故宫文物月刊》2008年第10期, 第108—117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绘本《西域土地人物图》后的所附的《西域沿革略》内容较明嘉靖《陕西通志》中的《西域土地内属略》更为详细。
6. Claudio Cerreti, *Carte di Riso: Far Eastern Cartography with a Complete Catalogue of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Maps Owned by the Societ à Geographica Italiana*, Roma: Societ à Geographica Italiana, 2003, p.140—141, 218.
7. (明) 赵廷瑞修, 马理、吕柟纂:《陕西通志》, 董健桥等点校, 第484—510页。李之勤:《西域史地三种资料校注》之《西域土地人物图校注》, 第48—69页。
8. (日) 海野一隆:《「陕西四镇图说」所载西域图略について》,《東洋学報》1993年第74卷(3·4), 第227—263页。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所藏《陕西四镇图说》之《甘肃镇图说》残卷中及上海图书馆善本部藏《陕西四镇图说》之《甘肃镇图说》后, 均无《西域图略》。
9. (明) 赵廷瑞修, 马理、吕柟纂:《陕西通志》, 董健桥等点校, 第18页。《河套西域图》一书, 仅见于《陕西通志》所引, 不见于《千顷堂书目》、《国史经籍志》、《内阁藏书目录》、《明史·艺文志》等明清官私书目, 作者和撰著年代不详。从嘉靖二十一年编著的《陕西通志》征引此书来看, 此书编著于明嘉靖二十一年之前。
10. 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年。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地图》2014年第1期, 第26—33页。
11. 洪业:《考利玛窦世界地图》,《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3、4期《利玛窦世界地图专号》; (日) 船越昭生:《坤輿万国全图と锁国日本——世界的视図の成立》,《東洋学報》1970年第41册, 第684—685页; 曹婉如、薄树人、郑锡煌等:《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 第57—70、102—103页; 黄时鉴、龚纓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 (日) 海野一隆:《利瑪竇『坤輿万国全图』の諸版》,《東洋学報》2005年第87册第1期, 第101—143页; 梅晓娟、周晓光:《利玛窦传播西学的文化适应策略——以〈坤輿万国全图〉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第716—721页。
12. (日) 鮎泽信太郎:《利瑪竇の两仪玄览图に就いて》,《历史教育》1936年第11卷第7期; (日) 鮎泽信太郎:《マテオ・リッチの两仪玄览图について》,《地理学史研究》(古地图特集) 1957年; 王绵厚:《利瑪竇〈坤輿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的比较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 第214—222页; 杨雨雷:《韩国所见〈两仪玄览图〉》,《文献》2002年第4期, 第273—280页; (日) 铃木信昭:《朝鲜肃宗三十四年描入り〈坤輿万国全图〉考》,《史苑》2003年第63卷第2期; 杨雨雷:《利瑪竇世界地图传入韩国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1期, 第92—99页; (日) 铃木信昭:《朝鮮に伝来した利瑪竇〈两仪玄览图〉》,《朝鲜学報》2006年第201卷; (日) 铃木信昭:《利瑪竇〈两仪玄览图〉考》,《朝鲜学報》2008年第206卷。
13. 钱江:《一幅新近发现的明朝中叶彩绘航海图》,《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1期, 第1—7页; 陈佳荣:《〈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交通图〉编绘时间、特色及海外交通地名略析》,《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 第52—66页; 郭育生、刘义杰:《〈东西洋航海图〉成图时间初探》,《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 第67—81页; 孙光圻、苏作靖:《中国古代航海总图首例——牛津大学

藏<雪尔登中国地图>研究之一》，《中国航海》2012年第2期，第84—88页；Robert Batchelor, The Selden Map Rediscovered: A Chinese Map of East Asian Shipping Routes, c.1619, *Imago Mundi: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2013, Vol.65, No.1, pp.37—63.

14. (日) 海野一隆:《ヨロツパにおける広輿図 -- シナ地学西漸の初期状況》,《大阪大学教養部研究集録(人文・社会科学)》1978年第26卷,第1—28页;高泳源:《卫匡国(马尔蒂尼)的<中国新图志>》,《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第366—374页;黄盛璋:《卫匡国<中国新图志>书名、性质“新”的正解与其二重性研究任务的方向、道路初论》,刘迎胜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第200—229页;宋黎明:《中国地图:罗明坚和利玛窦》,《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112—119页;汪前进:《罗明坚编绘<中国地图集>所依据中文原始资料新探》,《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120—128页。

15. Walter Fuchs, *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8, Peiping: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1946; (日) 海野一隆:《広輿図の諸版本》,《大阪大学教養部研究集録(人文・社会科学)》1966年第14卷,第147—164页; (日) 海野一隆:《広輿図の資料となった地図類》,《大阪大学教養部研究集録(人文・社会科学)》1967年第15卷,第19—47页; (日) 海野一隆:《「広輿図」の反響 -- 明・清の書籍に見られる広輿図系の諸図》,《大阪大学教養部研究集録(人文・社会科学)》1975年第23卷,第1—34页;任金城:《<广輿图>的学术价值及其不同的版本》,《文献》1991年第1期,第118—133页;任金城:《广輿图在中国地图学史上的贡献及其影响》,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卷)》,第118—133页; (日) 海野一隆:《地図文化史上の広輿図》,久武哲也、小林茂監修,要木佳美編,東京:東洋文庫,2010年。

3-5. 17世纪耶稣会地图中的明人图像

1. 关于地图的评价标准,数据正确的描绘无法完全诠释地图的所有价值,尤其是艺术价值。

2. 张西平等合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斯卡尔德志尼撰,华东师大出版社,2012年。

3. Allen, James Peter, *Middle Egypti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Hieroglyph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 参看: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touche_\(cartography\)](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touche_(cartography)).

5. David Woodward. *Art and Cartography: Six Historical Essay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6. F. J. Manasek. *Collecting old maps*, Terra Nova Press, Norwich, Vermont, 1998.

7. Raymond Lister. *How to identify old maps and globes*, London, Gbell and sons Ltd, 1965.

8. 参看世界数字图书馆: <http://www.wdl.org/zh/item/2889/#contributors=Adrichem%2C+Christiaan+van%281533-1585%29>

9. Raymond Lister. *How to identify old maps and globes*, London, Gbell and sons Ltd, 1965P.62.

10. David Woodward. *Art and Cartography: Six Historical Essay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第157页。

14. David Woodward. *Art and Cartography: Six Historical Essays*.

15. 张西平等合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第200—201页。

23. 陈高华主编:《中国服饰通史》,宁波出版社,2002年。

24. 张西平等合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

25. 费赖之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年。

26. 张西平等合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

27. 陈高华主编:《中国服饰通史》。

28. 同上。

26. 张西平等合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

27. 陈高华主编:《中国服饰通史》。

28. 同上。

29. 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

30. 裴化行著:《利玛窦神父传》,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31. 利玛窦、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中华书局,2010年。

32. 裴化行著:《利玛窦神父传》。

33. 1587年7月24日(天正15年6月19日),丰臣秀吉发布伴天连追放令,下令驱逐在日本的外国传教士。此后在江户时代,德川将军又多次颁布禁教令,强迫日本的天主教徒(当时被称为“吉利支丹”)放弃其信仰。有一部分天主教徒放弃了信仰(転びキリシタン);但另一部分

人则称为“潜伏吉利支丹”（隠れキリシタン），表面上放弃信仰改信佛教，暗地里仍在信仰天主教。这些潜伏吉利支丹，将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像当作天主教中的圣母玛利亚进行礼拜。这些被当作圣母玛利亚的观音像，被日本人则称为“潜伏吉利支丹”（隠れキリシタン），表面上放弃信仰改信佛教，暗地里仍在信仰天主教。这些潜伏吉利支丹，将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像当作天主教中的圣母玛利亚进行礼拜。这些被当作圣母玛利亚的观音像，被日本人称作玛利亚观音像。大多数玛利亚观音像使用中国的青瓷制造，也有使用白瓷制造的慈母观音（送子观音）像。慈母观音是从中国发祥的一种观音像，其造型是慈祥的观世音菩萨怀抱着一名年幼的婴儿。肥前（长崎县）的浦上（今长崎市浦上）、平户、五岛列岛等地的潜伏吉利支丹，使用慈母观音像为崇拜对象，影射圣母玛利亚抱着年幼的耶稣基督。玛利亚观音像的胸前雕刻着十字架，潜伏吉利支丹在祈祷时向其礼拜。日本各地的玛利亚观音像形状各不相同。直到1873年（明治6年）日本废除禁教令之后，这种文化逐渐消失。

34. 李爽著：《明末耶稣会翻译文学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

35. 同上。

36. 同上。

37. 利玛窦、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札记》。

38. 同上。

39. 郭咏观：《从医学角度看耶稣的苦难》，未刊稿。

40. 顾炎武著：《菴中随笔》，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中华书局，1995年。

41. 注二：卫匡国在编辑《中国新地图集》一书时很可能参阅了两部著作，分别是《大明统一志》和《广輿记》第二十一卷之第四页，提到了鸡足山。两名印度僧人，摄摩腾（Kasyapa）和达摩（Dharm）在进入中国前，分别在67年和520年时住在这里。张西平等合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

42. 同上。

43. 王海涛著：《云南佛教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

44. 同上。

45. 同上。

46. 张西平等合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

47. David Woodward. Art and Cartography: Six Historical Essays.

48. 张西平等合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

49. 同上。

50. 汪日楨著：《湖蚕述》，蒋猷龙注释，农业出版社，1987年。

51. 同上。

52. 章楷著：《中国古代养蚕技术史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5年。

53. 郑珍等著：《柞蚕三书》，华德公、杨洪江校注，农业出版社，1985年。

54. 张西平等合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

55. 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

56. 柯毅霖著：《晚明基督论》，王志成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第四单元

4-1. 进入外国市场：外销广东铜胎画珐琅

1. 在乔纳森·鲁费尔（Jonathan Ruffer, Curatorial Grant Art Fund, 2013）的帮助下，这个项目也得到了艺术基金会的支持。

2. 关于搪瓷制品历史的概述，请参见 Erica Speel, *An Illustrated Survey 1500—1920*, Hampshire: Lund Humphries, 2008.

3. 施静菲的《日月光华：清国画珐琅》介绍了玻璃胎、金属胎画珐琅的历史和耶稣会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施静菲著：《日月光华：清国画珐琅》，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馆出版社，2012年；许晓东，故宫博物院和德国柏林马普研究所合作课题“康熙、雍正时期宫廷与地方画珐琅技术的互动”，《宫廷与地方17—18世纪的技术交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277—335页；埃米莉·B·柯蒂斯（Emily B. Curtis）著：《1550—1800年中欧的玻璃器交易》（*Glass exchang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法纳姆，英格兰—美国佛蒙特州伯灵顿：Ashgate出版社，2009年；哈里·加纳（Harry Garner）：《粉彩起源》（*The Origins of Famille Rose*），《1966—1969年东方瓷器协会学报》，第37卷，1970年，第1—16页；乔治·勒尔（George Loehr）：《清廷上的传教士画家》（*Missionary-artists at the Manchu Court*），《1962—1963年东方瓷器协会学报》，第34卷，1964年，第51—67页。

4. 维罗妮卡·诺蒂尼（Véronique Notin）著：《从利摩日到北京的珐琅》，（*L' émail peint de Limoges à Pékin*），*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 et historique du Limousin*, CXL, 第85—107页。

5. 施静菲著：《日月光华：清国画珐琅》；许晓东著：《宫廷与地方17—18世纪的技术交流》。

6. 故宫博物院编著：《广东献给清廷的贡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杨伯达，故宫博物院的《从清宫旧藏18世纪广东贡品管窥广东工艺的特点与地位》。《广东献给清廷的贡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68页。

7. 孟露夏：《适应国外市场——出口泰国的中国搪瓷制品》（*Adapting to Foreign Demands Chinese enameled copperwares for the Thai market*），出自安妮·哈布（Anne

Höbu) 和道恩·F·鲁尼 (Dawn F. Rooney) 编著的《暹罗的王室瓷器——开启林的收藏箱》(Royal Porcelain from Siam. Unpacking the Ring collection), 奥斯陆: Hermes 出版社, 2013年, 第107-123页; 中国瓷器公司, 《18世纪的中国画珐琅》(Chinese Painted Enamels of the 18th Century), 纽约: 中国瓷器公司, 1993年; 迈克尔·吉林厄姆 (Michael Gillingham), 《中国画珐琅》(Chinese Painted Enamels), 牛津: 阿什莫尔博物馆出版社, 1978年。

8. 托弗·克莱门森 (Tove Clemmensen) 和莫恩斯·B·麦克普朗 (Mogens B. Mackeprang) 著: *Kina og Danmark 1600-1950. Kinafartog Kinamode*. København: Nationalmuseet, 1980年, 第148-149页; 扬·威尔金 (Jan Wirgin), *Från Kina till Europa. Kinesiska Konstföremål från de ostindiska kompaniernastid*, 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东亚博物馆出版社, 1998年, 第243页。

9. 罗伯特·L·霍布森 (Robert L. Hobson): 《关于广州搪瓷品的记录》(A note on Canton enamels), 《伯灵顿杂志》, 22, 117期, 1912年, 第65-167页。

10. 吕章申编著, 《瓷之韵: 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藏瓷精品》,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12年, 第253页, 编号081。

11. 孟露夏: 《中欧瓷器贸易: 大宗出口和订制品》, 出自吕章申编著的《瓷之韵: 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藏瓷精品》,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12年, 14-24页; 罗斯·克尔 (Rose Kerr) 和路易莎·E·曼格尼, 《中国出口瓷器》(Chinese Export Ceramics), 伦敦: 维多利亚和阿伯特博物馆, 2011年, 第39-57页。

12. 吉林厄姆, 《中国画珐琅》, 1978年, 编号42。

13. 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档案馆, 默多克·史密斯 (Murdoch Smith) 的档案 MA/1/S2325, 第7卷, 1884年; 克尔和曼格尼, 2011年, 第105-107页。

14. 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档案馆, 默多克·史密斯的档案 MA/1/S2325, 第7卷, 收藏品的报告, 1884年3月31日。

15. 罗伯特·J·默多克·史密斯, 《波斯艺术》(Persian Art), 伦敦: Chapman and Hall 出版社, 1876年, 第81页。

16. 奥斯陆大学的文化历史博物馆正在展出“暹罗的王室瓷器”, 主要展品为五彩瓷碗和出口泰国的中国搪瓷制品, 由西奥多·林在1904年捐赠。参见孟露夏: 《适应国外市场——出口泰国的中国搪瓷制品》, 出自安妮·哈布和道恩·F·鲁尼编著的《暹罗的王室瓷器——开启林的收藏箱》。奥斯陆: Hermes 出版社, 2013年, 第107-123页。

17. 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档案馆, 斯特凡诺·卡杜 (Stefano Cardu) 名下的档案, MA/1/C409/1, 1894年。

18. 丽莎·麦奎尔 (Lisa McQuail), 《双国宝藏——泰国王室送给美国的礼物》(Treasures of Two Nations Thai Royal Gifts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华盛顿: 史密森尼学会出版社, 1997年, 第21-24页和第52-65页。

19. 感谢罗伯特·蓬希恩 (Dr Robert Pontsioen) 博士、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史密森尼学会提供题字的图片 (博物馆标号 27274-3)。

20. 在皮姆巴帕·比萨普特拉 (Pim-Praphai Bisalputra) 女士的帮助下, 我得以拜访 Wat Pho 寺院以及与 Phrarajawetee 师父见面, 在此对比萨普特拉女士表示感谢。

4-2. 启蒙的艺术

波兰王奥古斯都一世收藏的中国外销瓷研究

1. 奥古斯都一世 (Friedrich August I, der Starke) 生于1670年5月12日, 卒于1733年2月1日。德语中 der Starke 意指强壮有力, 故在欧洲历史上奥古斯都一世也被称为奥古斯都·强力王。神圣罗马帝国全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或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 是962年至1806年在西欧和中欧的一个封建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版图大致相当于今日的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瑞士、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全境, 丹麦、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大部, 法国东部、波兰西部和意大利北部。
2. 奥古斯都一世收藏的文艺复兴绘画, 包含了著名的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 以及出自达·芬奇和伦勃朗之手的素描手稿。
3. 埃门 (Eimen) 自治市在北区, 霍兹敏登 (Holzminden) 在下萨克森 (Niedersachsen) (德国)。
4. Essen, *Barock in Dresden: Kunst und Kunstalungen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urfürsten Friedrich August*, LEPZIG 1986, Page 3 埃森, 《德累斯顿的巴洛克风格: 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执政时期的艺术收藏》, 莱比锡, 1986年, 第3页。
5.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一世, 1721年收藏清单, 第一章。
6.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一世, 1721年收藏清单, 第三章。
7. 大部分日本伊万里风格的瓷器都被收录于第一卷第二章中, 该卷的旧式德文名称为: “Dieses Porzellan ist durchgehends mit dem signo + bezeichnet worden, damit man es bey Ansicht bald von dem chinesischen und anderen so auch gewisse signa haben, distinguiren könne”。
8. 从奥斯卡·鲁克家族购买的瓷器, 部分于1922年进行了修复。德累斯顿茨温格宫博物馆瓷器部主任寇拉·乌荷梅尔提供线索。
9. 茨温格宫瓷器博物馆对奥古斯都一世的瓷器进行了重新编号, 其编号开头为 PO。
10. 维尔纳·施耐德 (Werner Schneider Adams), 《启蒙运动词典》(Enlightenment Dictionary), 德国慕尼黑出版社, 1995年, 第3页。
11. 笔者在欧洲各博物馆考察期间, 荷兰、英国和德国的博物馆都有类似的收藏件。

12. 简·雅格·罗斯(Jean-jacques Roussau, 1712—1778)著:《爱弥尔或关于艺术教育》(*Emile or on Education*),第38页。
13. 《景德镇陶录》载:“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

4-3. 灵感来源,借鉴,创新:

英国布莱顿皇宫(1802—1823)里的中式图像、配色与设计

1. 罗伯特·休伊什,第2卷,伦敦:托马斯·凯利出版社,1831年。
2. 对西莫(Seymour)版画的详细描述请参见:K.贝克(Baker)著:《乔治四世,讽刺画中的生活》(*George IV A Life in Caricature*,伦敦:泰晤士与哈德逊出版社,2005年),第131页。
3. 参见贝克著:《乔治四世》,第139页。
4. 参见S.帕里森(S. Parisien)著:《乔治四世:大娱乐》,伦敦:约翰·穆雷出版社,2001年,第116-165页。
5. 同上,第143页。
6. 钱伯斯著:《克右花园与建筑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和透视图,公主殿下威尔士王妃太后的座位》,伦敦:哈勃科恩出版社,以创办人命名,1763年,第5页;还有一部分引自考纳的《西方的东方式建筑》,伦敦:托马斯·哈德森出版社,1979年,第82页。
7. 钱伯斯著:《平面图》,第4页。
8. 同上,第6页。
9. 罗伯特·琼斯:《1821-1823年账本》。手稿。《国家档案局:张伯伦勋爵署》:比尔图书,丛书四,1820年,第3页。
10. 奥尔德里奇:《约翰·克雷斯和约翰·索恩:在时境下的合作》,发表于《传统漆艺新闻》,第2卷,4号,2009年5月,爱丁堡:传统漆艺论坛,2009年,第21-29页。
11. 左凡妮:《夏洛特皇后与她的两个大儿子》,约1765年,布面油画,1122x128.3cm。皇家收藏信托/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编号RCIN 400146。
12. 关于玛丽皇后的中国收藏请参加:威尔逊:《一种趣味现象,玛丽皇后二世的的中国用品》,发表于《阿波罗》,96.3.116-23,1972年。
13. 派恩著:《温莎城堡、圣詹姆斯宫,卡尔顿宫,肯辛顿宫,汉普顿宫,白金汉屋和浮若阁摩尔宫的皇家住宅史》,伦敦:大卫·哈里森书屋,1819年,第1卷,第116页。
14. J. 罗伯茨编:《乔治三世与夏洛特王后:赞助,收集与宫廷趣味》,伦敦:皇家收藏企业有限公司,2001年,第143页。
15. 同上,第120页。
16. 派恩著:《皇家住宅》,第2卷,《白金汉宫》,第21页。正对着它的是一件斯蒂凡诺夫绘画、D.哈佛尔雕刻的图版。
17. 罗伯茨著:《乔治三世》,第120页。
18. 派恩著:《皇家住宅:皇后住处,浮若阁摩尔的历史》,第1卷,第1-3页。
19. 描绘夏洛特皇后和她女儿们的作品在罗伯茨的《皇家艺术家:从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到今天》,伦敦:格拉芙顿图书,书中有详细论述,见第74-80页。
20. 派恩著:《皇家住宅:皇后住处,浮若阁摩尔的历史》,第1卷,扉页17。
21. 同上,扉页21。
22. 同上,第18页。
23. 同上,第19页。
24. 罗伯茨著:《乔治三世》,第147-148页。
25. 派恩著:《皇家住宅:皇后住处,浮若阁摩尔的历史》,卷1,第20-21页。
26. 罗伯茨著:《乔治三世》,第380页。
27. 派恩著:《皇家住宅:皇后住处,浮若阁摩尔的历史》,卷1,第21页。
28. 罗伯茨著:《乔治三世》,第150页。
29. 同上,第148页。Ibid. p.148
30. W. 亚历山大著:《中国的服装 四十八幅彩色版画图示》,威廉·米勒,伦敦,1805年。
31. 贝尔来格:《中国式客厅的装潢,卡尔顿宫》,发表于《伯灵顿杂志》,第109卷,第774号(1967年9月),第518—528页。
32. 贝尔来格著:《卡尔顿宫:乔治四世宫殿的昔日辉煌》,伦敦:白金汉宫,1991年。
33. 派恩著:《皇家住宅:卡尔顿宫》,第3卷,第12页。
34. 托马斯·希尔顿著:《橱柜设计师及家具商图鉴》,第三部分,第2卷,伦敦:本斯莱出版社,以创办人命名,1793年。
35. 同上,第50—51页。
36. 贝尔来格著:《卡尔顿宫》,第20页,引自弗里克与亨德森的账簿。
37. 派恩著:《皇家住宅:卡尔顿宫》,第3卷,第31-32页,有两幅图片。
38. 《克雷斯分类账》。是克雷斯及其儿子们在1802-1804年,1815-1819年及1820-1823年间在馆中留下的书籍的账项。《皇家厅室档案》。
39. 同上。
40. 见《克雷斯分类账》,1802年12月3日账项,第40页:“为来自卡尔顿宫的三件中国人物形象做修复及上漆。”
41. 贝尔来格著:《卡尔顿宫》,第20页。
42. 阿斯皮诺尔编:《给乔治国王四世的信件,181201830年》,共3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38年,第1卷,lvii - lx。
43. J. 莫利,《皇家厅室的建造》,伦敦:苏富比出版社,1984年,第25页。

44. 莫里斯·布洛克:《摄政时期的造型:王子与装潢师》,见《行家》,1853年,第531号,第130页。
45. 同上。
- 46.《克雷斯科分类账》,1802年8月25日至12月24日账项,第6页。
47. 同上,1815年账项,第77-78页。
48. 同上,第80页。
49. 同上,1818年账项,第91页。
50. 弗里德里克·克雷斯科著:《弗里德里克·克雷斯科的设计书》。书中收录了弗里德里克·克雷斯科1800年至1820年间的68幅彩色中国风装饰设计图。收藏于布莱顿博物馆与美术馆,版画与素描收藏,第FA103696号。
51. 见莫利著:《厅室》,第80页,他在文中讨论了弗里德里克·克雷斯科绘图风格更加复杂的素描簿,与他父亲“有些过时的中国风格运用”做了比较。
- 52.《克雷斯科分类账》,1820年账项,第110页。
53. 同上,第115页。
54. 莫利著:《厅室》,第25页。
55. 同上,第20页。
56. 罗伯茨著:《皇家艺术家》,第86页。
57. 莫利著:《厅室》,第25页。
58. 约翰·纳什著:《布莱顿的英皇阁》,伦敦,约翰·纳什受国王委托及批准而出版,1826年。
59. 本杰明·菲力著:《维尔比·普金及其父亲奥古斯都·普金回忆录;及对其作品的评论》,伦敦:爱德华·斯坦福出版社,1861年,第9页。
60. 同上。
61. 奥德里奇,《克雷斯科商行》,第5页。
62. 莫利著:《厅室》,第79页;奥德里奇著:《克雷斯科商行》,第47页。狄格顿绘画由克雷斯科家族的后代收藏,公共领域没有这幅作品的图片。
63. 奥德里奇在《克雷斯科商行》中详细讨论过这一书目,见第48页。这份书目的一份副本收藏于国家美术馆的《克雷斯科报告》中,见《克雷斯科家族:室内装潢》。
64. 哥顿·朗:《布莱顿皇家厅室:弗里德里克·克雷斯科的中国风格设计》,见奥德里奇,《克雷斯科家族》,第42-50页。
65. 布洛克著:《摄政时期的造型》,第130-131页。
- 66.《克雷斯科分类账》,1820年账项,第112页。
67. 布拉夫:《光泽的要义:作为19世纪早期室内装潢重要组成的表面抛光》,见英国修复研究所《装饰艺术的修复》,1999年,第1-10页。
- 68.《克雷斯科分类账》中228次提到“抛光”与“提亮”(见附录2)。
69. 布拉夫著:《《光泽的要义》》,第2-3页。
70. 同上,第3页。
71. 莫利:《厅室》,第79页。
- 72.《克雷斯科分类账》,1815年账项,第71页。
73. 同上。
74. 同上,1815年8月7日账项,第78页。
- 75.《张伯伦勋爵署》中的《英皇阁记事概略》,约1826年。海恩斯先生著,参考文献,Lib:23007/SB9/Ac2。手稿。《皇家厅室》。
- 76.《英皇阁记事概略》,第6页,抄本第48页。
77. 同上。
78. 同上。第8页,抄本第53页。
79. 史密斯著:《橱柜及家具制造指南:一部完整的绘图书,内含有关几何和视角的论述,适用于上述力学分支》,伦敦:琼斯出版公司,1826年。
80. 史密斯著:《橱柜制造商》,第164页。
81. 再版为《克雷斯科报告》,有关裱糊历史的两场演讲,于1839年2月4日和18日在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举行(出版处不详,1939年再版,萨格登与恩特威斯特撰写前言与评论)。
82. 同上。第30页。
83. 同上。第33页。
84. 莫利著:《厅室》,第79页。
85. 同上。
- 86.《克雷斯科报告》第33页。
87. 萨格登与埃德蒙森,《英国墙纸历史1509-1914年》,伦敦,BT巴特斯福德公司,1926年,第110页。
88. 同上。第105页。
89. 有关埃克哈特商行的结局细节,见同上,第111—113页。
90. B. Seeley. Stowe. A Description of the House and Gardens [Buckingham: printed and Sold by J. Seeley. 1817].
91. 同上。第39页。
92. 同上。第60页。
93. 贝文顿著:《斯托故居》,伦敦:保罗·霍博顿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94. 同上。第31页。
95. 奥克塔韦恩·达文马特著:《土耳其服饰》,有一系列版画插图;有英语和法语两个版本,伦敦:威廉·米勒出版社,1802年。
96. 同上。无页码。
97. 约翰·丁克尔著:《皇家宫殿》,伦敦:斯卡拉/菲利普·威尔逊出版社,1983年。
98. 同上。第71页。
99. 这个房间的部分装饰物在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的收藏中得以保存下来。2001年,伦敦的露西·阿斯克尤与网络上的模型制造商以1:32的比例制作了一件玻璃房模型,这件模型正在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的英国展厅展出(博物馆编号,NCOL3-2001)。
- 100.《诺森伯兰宫工作账簿》,诺波兰遗物。编号.SY.U183。
101. 同上。
102. 修·罗伯特斯:《御座再现》,收录于《家具的历史》,第43卷,2007年,第43-54页。

103. 皇家图书馆藏书编号 RL18741, RL18742, RL18743 和 RL18744。

104 修·罗伯特斯著：《御座再现》，第 47-48 页。

105. 1838 年陛下的《英国宫廷日程》，这是维多利亚女王就任皇位的第一年，或者说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统一大不列颠、爱尔兰及其殖民地的一年，伦敦：瓦恩哈姆出版，1838 年。

106. 威尔莫特著：《布莱顿英皇阁宫廷和花园描述指南》。新版本中有皇家住宅的插图，布莱顿：查尔斯·维尔莫特出版社，1851 年，第 14 页。

107. 莫利著：《厅室》，第 78-83 页。

108. 同上。第 79 页。

109. 莫利著：《厅室》，第 79 页。

110. 《英皇阁记事概略》，第 71-75 页。

111. 同上，1822 年 11 月账项，第 10 页。

112. 同上。第 11 页。

4-6. 詹姆斯·理雅各跨文化交流中的伦理与审美： 19 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中西方经验

1. 关于米尔恰·伊利亚德，可参见维基百科文章，即我写的《微笑与低语：怀想米尔恰·伊利亚德在宗教研究方面的重要性》（Smiles and Whispers: Nostalgic Reflections on Mircea Eliade's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第 143-164 页，收录于布莱恩·雷尼（Bryan Rennie）编辑的《改变宗教世界，米尔恰·伊利亚德的意义与终结》（Changing Religious Worlds, The Meaning and End of Mircea Eliade，奥尔巴尼：SUNY 出版社，2001 年）；以及我（与马克·李克特一起）编辑的《想象与意义：米尔恰·伊利亚德的学术与文学世界》（Imagination and Meaning: The Scholarly and Literary Worlds of Mircea Eliade，纽约，西伯里·温世顿/哈勃与路出版社，1982 年）；还有我（与布莱恩·雷尼一起）编辑的文集《回忆/重想/再评米尔恰·伊利亚德在宗教史上的研究》，15，（Remembering/Reimagining/Revalorizing Mircea Eliade in Archaeu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2011 年，1-2 分册）。余国藩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人类学、社会思想、东亚语言与文明、英语文学、申学校以及比较文学的杰出退休教授。他以翻译了四卷本《西游记》而尤为著名。

2. 这本书将于 2015 年初面世。

3. 引自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翻译的《庄子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 [Zhuangzi]，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8 年），第 49 页。原文“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对此，

詹姆斯·理雅各的译文为：“Formerly, I Zhuang Zhou dreamt that I was a butterfly, a butterfly flying about, feeling that it was enjoying itself. I did not know that it was Zhou. Suddenly I awoke, and was myself again, the veritable Zhou. I did not know whether it had formerly been Zhou dreaming that he was a butterfly, or it was now a butterfly dreaming that it was Zhou. But between Zhou and a butterfly there must be a difference. This is a case of what is call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关于庄子及蝴蝶之寓意，参见我的著作《早期道家传说与意义》（Myth and Meaning in Early Taoism，伯克利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 年、1989 年）。新修订带中文字的版本现已出版：《早期道家传说与意义，混沌理论》（Myth and Meaning in Early Daoism, The Theme of Chaos (Hundun)，马格达雷纳：三松出版社，2008 年）。

4. 一些对全球的和跨学科层面上的比较的新理解的讨论，可参见丽塔·菲尔希（Rita Felshi）和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 Stanford Friedman）编辑的《比较：理论、方法、运用》（Comparison: Theories, Approaches, Uses，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13 年）。

5. 我对这些有关“比较”的问题的讨论，见《维多利亚时代对中国的翻译，詹姆斯·理雅各的东方朝圣》（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伯克利与伦敦：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2 年）。

6. 参见詹姆斯·理雅各，《中国经典：合译、评注、绪论及大量索引》，5 卷。（香港：理雅各；伦敦：特博纳，1861-1872 年）。关于《孔子文集》，参见：卷 1：《论语》、《大学》、《中庸》（1861 年）。第二版修订本（1893 年），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2006 年在科斯莫出版社再版。

7. 《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Chaojin dongfang: Liyage ping chuan）段怀清译，（广西大学出版社，2011 年）。我编辑的研究生态问题的书中另一部是吉瑞的、詹姆斯·米勒和刘笑敢编辑的《道教与生态学。宇宙景观中的方式》（Daoism and Ecology. Ways Within a Cosmic Landscape，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 年）。另请参见《道教与生态：宇宙景观的内在之道》（Daojiao yu shengtai: yuzhou jingguan de neizai zhi dao，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年）。

8. 举例来说，可参见跨学科和比较性网站“The Immanent Frame”（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赞助，网址：<http://blogssrc.org/tif/the-state-of-religion-in-china/>）上的大量探究性文章/博文。

9. 有关上帝和天较为与时俱进且较深刻的比较性理解，可参见 David Pankenier 基于考古学与天文学基础，研究中国传统的全新著作《早期中国的占星学与宇宙学：顺应天

- 地》(Astrology and Cosmology in Early China: Conforming Earth to Heaven, 纽约: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0. 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 请参见《维多利亚时代对中国的翻译》, 多处提及。
11. 见《维多利亚时代对中国的翻译》, 第14-15页。
12. 有关翻译的美学, 请参见《维多利亚时代对中国的翻译》中的讨论, 尤见于第六章。
13. 关于邓小平是否真的曾经说过这句话的争论, 请参见维基百科引用的有关邓小平的讨论。
14. 有关神像或冥钱的传统, 参考文献有, 例如, 王斯福(S. Feuchtwang)的《中国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萨理郡: 柯曾出版社, 2001年)。
15. 引自《维多利亚时代对中国的翻译》。
16. 参见安德鲁·雅各布(Andrew Jacobs) 2011年4月22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一篇题为《》(Confucius Statue Vanishes Near Tiananmen Square)的文章, 阅读链接: http://www.nytimes.com/2011/04/23/world/asia/23confucius.html?_r=0。有关与当代中国新儒教相关的这些问题的著作中, 有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中国新儒教》(China's New Confucianism, 普林斯顿与牛津: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8年)及孙笑冬(Anna Sun)的《作为世界宗教的儒教: 有争议的历史与当代现实》(Confucianism as a World Religion: Contested Histories and Contemporary Realities,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7. 《维多利亚时代对中国的翻译》, 第36页。
18. 有关理雅各在中国的传教生涯, 尤其可以参见费乐仁(Lauren Pfister)的两部著作, 分别题为《为“人类的全部责任”而奋斗: 詹姆斯·理雅各(1815-1897年)》(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James Legge (1815-1897)), 和《苏格兰新教遭遇中国》(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收录于霍斯特·德雷舍(Horst W. Drescher)编著的苏格兰国际研究系列丛书(Scottish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ries)第34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 彼得朗出版社, 2004年)。
19. 有关王韬的旅行, 参见《漫游随录图记·香海羁踪》(My Sojourn in Hong Kong), 发表于约翰(John)和克斯汀·米勒(Kirstin Miller)的《香港》(Hong Kong, 旧金山: 编年史出版社, 1994年), 以及由伊恩·查普曼(Ian Chapman)翻译的《漫游随录选译》(Selections from Jottings from Carefree Travels (Man you sui lu))中的译文53/54。
20. 《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是一部亚洲宗教文献的里程碑式的50卷大型英文英文译作, 由马克思·穆勒(Max Müller)编辑, 由牛津大学出版社1879-1910年间出版。正是这部著作创造了等同于“scriptures”或“bibles”(圣经)的有关“世界宗教”的西方学术话语。参见松泽智子的《世界宗教的构建》(The Invention of World Religions, 芝加哥与伦敦: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2005年)。
21. 有关东方主义的内容, 参见《维多利亚时代对中国的翻译》及理查德·金(Richard King)的《东方学与宗教》(Orientalism and Religion, 伦敦及纽约: 劳特利奇出版公司, 1999年)。
22. 引自《维多利亚时代对中国的翻译》。
23. 中文原文为“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 詹姆斯·理雅各将其翻译为“To be able to judge of others by what is nigh in ourselves. This may be called the art of virtue”。
24. 这些趋势的示例之一, 见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 西方世界的终结与新世界秩序的诞生》(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纽约: 企鹅出版社, 2009年)。
25. 跨文化交流与教育的善意原则示例之一, 可参见卢斯基金会(Luce Foundation)在里海大学建立的“中国桥计划”(Chinese Bridge Project, 2009-2012年)。网络地址见: <http://chnbrdg.cas2.lehigh.edu/content/welcome>
26. 中文为“故說《詩》者, 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 是為得之。”理雅各的译文为: “Therefore, those who explain the odes, may not insist on one term so as to do violence to a sentence, nor on a sentence so as to do violence to the general scope. They must try with their thoughts to meet that scope, and then we shall apprehend it”。

“文明的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

主办： 银川当代美术馆
宁夏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总策划： 吕澎
学术主持： 曹意强

时间：2014年9月19日—9月20日 09:00—17:40

地点：银川凯宾斯基饭店 会议厅

会议主题：17-19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

“文明的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银川当代美术馆邀请来自6个国家的学者，通过学术会议与演讲的方式，以期推动中国艺术史上有关中西方交流的梳理及艺术演进轨迹研究的学术活动。

研讨会发言嘉宾：

Alexandra Loske	苏塞克斯大学艺术历史系博士
Angelo Cattaneo	欧洲大学学院历史专业博士
Anna Vermehren	Helmsdale 遗产与艺术协会 Timespan 美术馆总监
Anthony Viscardi	里海大学艺术建筑和设计系教授
Bruce Gordon Doar	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荣誉会员
Francesco Morena	专职从事亚洲艺术研究的学者
Lauren F. Pfister	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Norman J. Girardot	里海大学宗教研究系特聘名誉教授
Patrick Conner	马丁·格里高画廊主任及巴克奈尔大学兼职教授
Stefano U. Baldassarri	佛罗伦萨大学语言学博士及耶鲁大学意大利文学（文艺复兴的文学研究）博士
Terence Bennett	19世纪东亚和东南亚照片领域的独立研究者、作家和收藏家
范景中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
龚之允	苏塞克斯大学艺术史博士
郭亮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
胡光华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胡艺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博士
黄忠杰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
吕澎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
莫小也	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邵宏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史教授
席会东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副教授

（按姓名首字母排序）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的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汉英对照 /

吕澎主编.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53-2686-3

I. ①文… II. ①吕… III. ①东西文化—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文集—汉、英
②绘画史—中国—清后期—国际学术会议—文集—汉、英 IV. ① K103-53
② J209.2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6179 号

“文明的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吕 澎

总 指 导: 刘文锦

执行团队: 谢素贞 李伟琳 王雪川 班媛媛 陈建新 蒯颢天 姜龙玺 李 璐

马金玲 马 涛 任 娟 杨 哲 张晓云 张 云 赵子懿

资料校对: 张晓云 陈建新 王雪川

中文翻译: 孙 越

英文翻译: Bruce Gordon Doar

责任编辑: 杜惠玲

装帧设计: 简 枫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 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 辑 部: 010-57350504

门 市 部: 010-57350370

印 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48.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500.00元 (全二册)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